

【编者的话】

2012 年春天，中国政坛风云诡谲。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这场与中国未来走向密切相关的政坛风云，重要信息的最初来源几乎都是西方媒体。3 月中旬，美国《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英国人尼尔·海伍德在重庆的离奇死亡与“薄熙来事件”密切相关，有关“谣言”开始传遍网络。3 月底，英国《每日电讯报》《卫报》《金融时报》等媒体陆续跟进，揭发出更多令人目瞪口呆的内幕。直至 4 月，国外媒体渲染近一个月的“谣言”才最终被官方作实。



实际上，通过西方眼睛看中国政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候西方人的观察更能给人以启发。

本期周刊首先选入两篇西方政治家的陈述。在去年出版的《论中国》中，基辛格博士认为，与其说中美关系是“伙伴”，不如说是“共同演化”——这是既求合作又带防备的复杂心态。美国前国防部长哈姆雷则在采访中声称中国现存制度并不安全，但他同时坦承美国政府有时难免误读中国，以至决策错误。

政治家关心制度和利益，知识界则更倾向于描述社会的趋势和变化。在经济观察报主笔李翔看来，西方知识界描述中国政治的书籍时常在两个极端摇摆：中国时而是一个创造了崭新制度崛起不可阻挡的大国，时而又是一个极权统治面临崩溃的国度。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认为，这种叙述上的矛盾来源于好奇，神秘和畏惧的情感组合以及标签化的思维倾向。

知识界热衷谈论中国，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热情也日益升温。在本期周刊的第三部分，我们关注报道中国的西方媒体人，三篇文章分别从刘香成、吉米、金玉米几位西方记者（或公民记者）的视角出发。他们都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对中国的复杂性有充分认识。他们各自的局限来源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地理意识，但作为外国媒体人，他们在报道中国政治时有巨大优势：发声不受权力所限。

最后，我们回溯历史长河，看看历史上西方眼睛中的中国政治。40 年前的导演安东尼奥尼，70 年前的记者斯诺，700 年多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他们都在各自的年代以最具开创性的方式，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最真实的一面。这些伟大的记录者塑造了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影响了一代代后来者看待中国的方式。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述】

10-1 基辛格：关于中国挑战

“当中美两国四十年前初次恢复关系之时，那一代领导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愿意把眼光投视到当下问题之外。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幸运的，长期的彼此隔绝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事务。”



社会与国家乐于想象自身的永恒。它们同样珍视自己的起源神话。中华文明的特点在于它似乎看不到起点。在历史长河中它更象一个永恒的自然现象而不是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在黄帝这一令无数中国人敬畏的创始君王传奇中，中国似乎就已经存在了。

历史上的黄帝是一个开创性的英雄，然而在创始神话中，他仅仅重建而非创造了一个帝国。中国先于他而存在，中国闯入历史意识时，它是一个已然建立的国度，只待复兴，不必创造。

大抵说来，中国的政治智慧倾向于视整个战略图景为一体：善与恶，近与远，强与弱，过去与未来都彼此关联。西方人将历史视作一系列克服罪恶与落后的决定性胜利，通往现代化的过程，而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强调的是从衰落到复兴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自然和世界可以被理解，但不可能被完全主宰。



对中国古代的智者来说，世界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明智的君王只能顺应其潮流。不存在一个等待人类发现的新世界，不存在遥远彼岸等待他们的救赎。那片乐土就是中国，而中国人已然在此。理论上来说中央帝国的文化福祉也许可以经由其无上的榜样力量传播至帝国边的外族。但是漂洋过海令“异教徒”皈依中华文明并非荣耀之举；天朝的习俗并非远方的蛮族能够习得。

尼克松任内最戏剧化的事件几乎完全发生在黑暗之中。尼克松坚信去往中国的外交使命若要成功，必须秘密从事。公开的使命必定会触发美国政府复杂的内部背景调查程序，以及来自全世界，包括台湾（仍然是官方承认的中国政府的强烈磋商请求）。这将危及我们和北京的前景，其态度我们还有待观察。透明度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建立一个和平国际秩序的历史性机遇同样紧迫。

因此我的团队出发经由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公开宣称是代表总统进行的实情调查之旅。我们的团队包括各个部门的美国官员，以及前往北京的核心小组——我本人，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三名助手及两名安全特工。为了抵达那个戏剧性的终点，我们必须疲惫地在每个城市停留，煞有介事，枯燥无比，以致媒体不再追踪我们的行程。在拉瓦尔品第，我借口在喜马拉雅山脚的一个巴基斯坦山间避暑地休息（假装生病），消失了 48 个小时——但我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后来的将军）了解我真正的使命。

当美国代表团 1971 年 7 月 9 日抵达北京时，我已然经历过中国人微妙的交流方式，但并不了解北京的谈判方式，更不了解中国人迎客的方式。美国人与共产党人的外交经验来自它与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主要是安德烈·葛罗米柯，此人善于将外交事务转变成官僚意志的考验；他在谈判中的正确无可挑剔，但在实质问题上寸步不让——有时让人感觉他在过分地自律。

中国对秘密使团的接待和在随后的对话中，却无任何过分之举。在我们前期操作中，我们时常会为他们反复无常的信息中断而困惑，我们猜想那可能与文化大革命有关。而此时似乎没有什么能干扰东道主的沉着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欢迎美国总统特别使节似乎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北京受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欢迎后，我们很快发现东道主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无比宽松的时间表——这似乎在表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孤立之后，他们并不急于达成一个实质性的条约。除去两晚 16 小时的休息，这两个曾经卷入战争，濒临战争，历经 20 年未有任何外交接触的国家只有不到 24 小时来进行它们之间的第一场对话。实际上正式的谈判只有两场：我抵达那天从下午 4：30 到晚间 11：20 的 7 个小时；第二天从中午到下午 6:30 的 6 个小时。

也许可以说中国人显而易见的淡漠是在施展一种心理压力。当然，我们此行若毫无进展，对尼克松总统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尴尬。但假如对两年来的中国外交估计正确的话，毛泽东是迫于情势紧急才向我们发出邀请，而北京对美国使团的冷落只会使情势急转直下。

对抗对双方都没好处，那就是我们来北京的理由。尼克松急切地想让美国将目光投向越南以外。毛的决定则是意在迫使苏联武力对抗中国之前做到三思而行。双方都不能失败。双方都深知其利害关系。

双方的分析罕见地一致，我们决定利用大部分时间探讨彼此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因为访问的终极目的是开启一个决定两国先前敌对外交政策是否可以重新调整的过程，事实上，一个概念性探讨——有时听起来更像两位国际关系教授的交谈而不是外交官的工作会谈——是现实外交的终极形式。

那天当周恩来总理到来时，我们的握手是一个深具象征性的手势——至少持续到尼克松抵达中国公开重复这一手势为止——1954 年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与周握手，这一轻蔑举动激怒了中国，尽管他们时常表明其无碍。接着我们来到宾馆会议室，面对面围着一张铺有绿色厚羊毛毯的桌子坐下。此时美国代表团第一次亲身面对这个与毛并肩经历了半个世纪革命、战争和外交斡旋的非凡人物。

7 个月之后，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总统在一个刺骨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总统来说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反共派，他看到并大胆抓住了这个地缘政治机遇。

为了象征他踌躇前行的顽强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他打算独自走下空军一号与周恩来相见，穿着一尘不染毛式中山装的周恩来站在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中国军乐队演奏着《星条旗

永不落》。那个象征性的，抹消杜勒斯轻侮的握手恰如其分地发生了。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性场景，它低调得些古怪。当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时，街道上已经清除了所有旁观者。他的到来是当天晚间新闻的最后一条。

这一开端固然深具革命性，但最后的公报还未达成完全一致——尤其是关于台湾的关键性条文。公开庆贺为时尚早，或许还会削弱中国故作镇定的谈判立场。

东道主为了弥补没有欢迎游行的不足，一抵达就邀请尼克松与毛会面。“邀请”并非对如何达成与毛会面过程的确切描述。会面时间从未确定，其发生就像一桩自然事件。正如同是帝王的召见。

我们抵达不久，便有迹象表明毛有可能邀请尼克松会面，我接到传话说周要在接待室里见我。他通知我“毛主席想见见总统。”为了避免尼克松被召见的印象，我提出了关于晚宴程序安排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周显得格外不耐烦，回答到：“由于是主席邀请，他想很快见到他。”毛在尼克松访问肇始，谈判还未开启时就接见他，是为了向国内国际的观众展示他权威性的认可。在周的陪同下，我们坐着中国的汽车驶向毛的住所。

通向毛的住所必须穿过东西轴线上的一个大门，共产党革命前这里曾是古城墙矗立之地。在皇城之内，道路环抱着一池湖水，另一边矗立着高官们的住宅。所有这些都建于中苏友好的年代，反映出那个时期浓重的斯大林风格。毛的住宅并无二致，只是稍稍远离其它的住宅。放眼望去也不见警卫或其它权力标属。一个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桌占满。

那无关紧要，我们被直接带进毛的书房，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三面墙都放满书架，堆放着零乱的手稿。桌上和地板上都堆满了书，墙角是一张简单的木床。统治着全球人口最多国度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希望被人视作一个哲人王，他无需传统帝王的标志来巩固他的威严。

沙发椅呈半圆形摆放，毛从正中的椅子里起身，身边的随从随时准备搀扶。后来我们得知在之前的几个星期毛患上了一系列严重的心肺疾病，行动艰难。克服着病痛的毛散发出强大的决心和意志力。他双手握住尼克松的手，脸上露出最善意的微笑。那张照片遍布中国所有的报纸。

尼克松访华是少有的对国际事务产生决定性变化的一次国事访问。中国重新进入全球外交事务，以及美国获取的更多战略抉择，为国际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灵活度。尼克松访华之后，其它西方民主国家及日本也进行了类似的访问。中美之间的协商到达了正式盟友之间都极为罕见的水平。

双方的利益是否存在真正的一致性？他们是否有可能将利益与普遍意识形态有效区分以避免情感冲突所导致的混乱？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为我们打开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大门，而这些挑战今日依然存在。

近年来，中国与现代西方所设国际体系的碰撞令中国的精英们——以其出色的全局思考和分析能力——讨论他们国家命运及实现该命运的总体战略时，形成了某种倾向。

根据某种中国战略思想，中美之间的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和“世纪对决”。

自从西方初次打开中国的大门，一场关于中国国力、影响力及野心的国家对话始终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着。事实上，世界正在目睹这场对话的新阶段。

国家命运论战的前阶段关注的是中国是否应当向外伸手获取知识以治疗其贫弱之症，还是向内背离那个技术先进却乌烟瘴气的世界。这一论战的现阶段则建立在自强的伟大计划已经成功，中国正在赶超西方的认知之上。它所寻求的是规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原则——在许多中国人甚至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眼中，这个世界曾极不公平地对待过中国，而中国正从这种屈辱中站起来。

“必胜主义”思想的一个例子是刘明福大校 2010 年的《中国梦》。在刘看来，不管中国如何承诺“和平崛起”，中美关系有其内在冲突。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一场“马拉松竞赛”和一场“世纪对决”。而且，这是一场零和竞赛；胜利之外的唯一可能便是屈辱的失败。

不管是必胜主义的中国式分析还是美国版本——中国的成功“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及世界的地位是互不相容的——都没有被任何一个政府所认同，但它为当前的很多思考提供了潜台词。假如这些观点背后的假设被任何一方所采纳——只要有一方就可以使其变得难以避免：中美轻易陷入不断升级的紧张状态。



中国会竭力将美国的影响力从其边境排除出去，限制美国的海军力量，降低美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重要性。美国会试图把中国的许多邻国组织起来以抗衡中国的控制。双方都会强调其意识形态的差别。使双方交往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双方有关威慑和先发制人的概念并不完全对称。美国更注重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中国更注重决定性的心理冲击。或早或晚，终有一方会做出错误的估计。

其问题最终归结为美国和中国能够现实地向对方要求些什么。美国为制约中国或者建立一个以意识形态斗争为目的的民主国家阵营而组织亚洲国家的露骨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是其大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同样，中国把美国从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完全排除的企图也会遭到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抗，因为它们惧怕单一权力统治该地区的后果。

中美关系更合适的标签应当是“共同演进”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它意味着两个国家追求各自内部的目标，在可能的时候进行合作，随时调整关系使冲突达到最小化。任何一方都不必认同对方的所有目标或假设利益的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寻求认知并发展彼此互补的利益。

人权问题将在整体互动中占据一席之地。假如美国不强调它对人类尊严和民众广泛参与政治则的支持，那就是背叛自己。基于现代技术的特点，这些原则将不受国境的约束。但经验表明以对抗方式来强加于人——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备强烈自我历史想象的国家，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历届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的前两年都努力地达成了长期道德信念与个案处理以适应国家安全需要之间的平衡。这一基本方法仍然可行；如何取得必要的平衡是双方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当中美两国四十年前初次恢复关系之时，那一代领导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愿意把眼光投视到当下问题之外。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幸运的，长期的彼此隔绝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事务。这使上一辈的领导人能够应对他们的未来，而不是即刻的压力，并为一个没有中美合作就无法获得的世界奠定了基础。

为了寻求对和平的理解，半个世纪前身为研究生的我就开始研究国际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我意识到观念上的文化、历史和战略差异将会对双方哪怕是最善意最具远见的领导人带来巨大

的挑战。另一方面，假如历史是过去的机械重复，变革就不会发生。一切伟大的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只是设想。

在“永久的和平”一文中，哲学家康德认为永久和平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只有两个：人类的洞察力，或巨大的冲突与灾难致使人类别无选择。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关头。

当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关于秘密访问的公报达成协议时，他说：“这将撼动世界。”如果 40 年后，中美两国能够同心协力建立世界而非撼动世界，那将是一个怎样的顶点。

基辛格摘自他的新书《关于中国》，5 月 17 日由企鹅集团出版。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1972 年随尼克松出访中国，最近出版新书《关于中国》。原文出处：译言网；译者：昼伏夜行；原文链接 http://select.yeeyan.org/view/209872/194770 ）

【返回目录】

10-2 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哈姆雷：一步之差—中国体制的天堂与地狱



“我没看到中国在制定一个能从根本上确保万无一失的应对办法，相反，你们却在绞尽脑汁进行更加有效的政治控制。好吧，我也希望我们国家能在政治上进行更有效的决策，但你们的高效决策过程却使你们更容易犯下大错。”

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中国体制

编者语：

美国“重回亚洲”以及其从中东地区的陆续撤兵又引起了不少担忧，也许新一轮的中美争斗即将上演。美国能够容忍另一个具备超级大国潜力国家的崛起吗？是否“中国模式”已经取代了“美国模式”？以下是环球时报记者王文(王)对话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裁约翰·哈姆雷（哈姆雷）。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总部设于华盛顿的智囊集团，主要致力于国际问题的研究。

王：一些中国人担心在拉登死后，美国将会把战略矛头对准中国。这种担忧合理吗？

哈姆雷：我认为，多数美国人会觉得中国的繁荣富强能使上亿人摆脱贫穷是一件好事。但的确，在未来的 10 年中，中美关系将会更加紧张。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因为中国会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动荡和复杂。

并不是谁故意想让中美关系更加紧张。但我坚信由于美国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泥沼之中，中国有人会以为他们将迎来更大的政治机遇。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但他们错了。我们没有阻碍什么。我认为许多美国人都目睹了中国的现代化程度，他们也想投身于此。

王：全世界只能有一个超级经济体？

哈姆雷：我不这么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过三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格局。第一种大约始于 1648 年。当时欧洲帝国崛起，他们相互较量，争夺世界的控制权。所以第一种国际格局形成于欧洲，而那时候美国和中国都只能靠边站。基于重商主义经济，这种国际格局的运作模式是联盟间实力的转换与制衡，以及高度的团结。除欧洲以外，世界剩余的部分都被卷入其中。那种国际格局从 1648 年持续至 1945 年。

由于二战破坏了欧洲帝国秩序的基础，所以二战后此国际格局瓦解。这使得权力从欧洲转移。二战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格局——有时也称作“冷战”时代。那是西方列强与美国一同与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世界对峙的格局。苏联试图将中国拉入其大本营。但中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退出，但此时国际格局已经在两大阵营中形成。1989 年苏联解体后，这种格局也随之瓦解。

现在我们正处于始于 1990 年的第三种国际格局。这个格局中只有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国，以及一系列的分散于各地区的大国。

南美的大国是巴西。南亚是印度。西亚是伊朗。欧洲是欧盟。非洲是南非或尼日利亚。在东亚则有“两虎”——中国和日本。此格局说不定还将持续 20 年。

王：你怎么看待“中国模式”？

哈姆雷：很多美国人都眼睁睁看着中国生龙活虎，我们表示很羡慕。中国发展得非常快。但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中国不受公民的个人权利的牵制。

但我还是觉得中国早晚要重新考虑其现在的发展模式，因为他们即将经历物质所带来的挫败。



举个例子，中国大概斥资 3 万亿搞高铁，但现在搞出了问题。当一个政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各种力量尚缺乏制衡就动手干一件事，它往往能够想出一些天才的点子并且干的有声有色，但它往往也会弄出大麻烦。

你们中国现在只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视食品和产品的安全。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当然会强烈要求实现体制中的制约和平衡，这会得到解决，而且将使中国政治经济的性质减弱。

实际上，我认为中国已经出于出大事的边缘了，因为人们相信政府官僚能进行一系列改革。而当年中国真正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刻正是政府官僚开始撒手不管的时刻。这时私人企业便可以大有作为，不必束手束脚。然后才中国开始迅猛向前发展。

我没看到中国在制定一个能从根本上确保万无一失的应对办法，相反，你们却在绞尽脑汁进行更加有效的政治控制。好吧，我也希望我们国家能在政治上进行更有效的决策，但你们的高效决策过程却使你们更容易犯下大错。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中国会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

王：那将会是美式民主吗？

哈姆雷：不。但中国肯定会更加多元化，有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完善的法制。我不认为这条路和我们现在的处境或我们的目的地相互矛盾。我就是不相信会那样。我们可能犯一些错误。我们可能误读了你们的真正动机，然后做出错误决策，你们同样也会。所以我们可能对此处置不当。但我认为中国内部潜在的动力并不会有损于我们的利益，而一个正在崛起的热爱和平的中国完全不会妨碍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王：你对 2020 年的国际秩序有何预测？

哈姆雷：跟现在没多大区别。

中国的 GDP 肯定会更高。美国会走出衰退期。这还要花 4 到 5 年的时间。我们的根本国力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我认为一个国家国力的根本是由人口规模、经济活力和智力活跃的健康

程度决定的。我们花在研究和发展上的精力比任何国家都多，我们的人民有很强的凝聚力，他们坚信政府是公正的，机会可遇可求。我们的公民社会极为强大，其活跃程度令人惊叹。

所以实质上美国将仍然十分强大。我不觉得美国在衰退。但我认为中国在不断前进。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威胁，但我不赞同。因为在中国国内将会发生很多合理的改变，它们使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兼容并济。

但对中国我也有一些忧虑。中国始终不断地对外过度宣传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受害者形象，现在好了，中国真的成受害者了。毫无疑问，中国在 100 年前或 50 年前是受害者。但在最近的 35 年中，美国一直试图助中国一臂之力。我们鼓励我们的企业到中国投资，也鼓励美国人去中国。

中国曾有一段时间受到残害，这不可否认，那时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羞辱中国政府，抢掠中国人民，用暴力将中国卷入鸦片市场，这几乎是犯罪。这段历史丑陋不堪。

所以毫无疑问中国曾饱受迫害。但那是在过去。而现在太多的中国人还在用这一番叙述来定义今日的中国。我认为他们该换换脑筋了。不过总的来说，不管是对美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还是中美关系，我还是相当乐观的。

（哈姆雷：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裁、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原文出处：译言网；译者：碧落 sky；原文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78187/197408 ）

【返回目录】

【书】

10-3 李翔：中国镜像



“年轻漂亮的维特克夫人（Roxane Witke）穿着自己的连衣裙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面容渐老的江青，并且不知道怎么竟然得到了采访江青六十个小时，并为她写一本传记的机会，‘我从没有跟一个外国人谈过我的过去，你是我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我从一长排的书写中国的书籍中找出了这本《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尽管在此之前我从未读过这本书，但是却早有耳闻。这本书因为预言中国即将崩溃而在中国大名鼎鼎，它的作者是章家敦，一名华裔律师，曾经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生活超过 20 年。

从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开始，描述中国的图书一直都不缺乏。只不过，描述的对象从可汗的金色帐篷和繁华的杭州城开始，在不断发生变化。《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在一段时间之内几乎是远东最有影响力的人。他能够跟皇帝，后来是总统交谈，能够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不用说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很多西方人抱怨说，当他们抵达北京时，车夫总是不由分说地将他们拉到位于王府井的莫理循的家。因为实在是有太多西方人到中国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访莫理循。他号称认识所有人，而所有人也都以认识他为荣耀。

和莫理循同时代的另一位因为描述中国而著名的作家是巴克斯爵士(E.Backhouse)。他曾经做过莫理循的助手，以对“龙夫人”慈禧太后的描述而著名。后来，另一位汉学家通过精细

的考证，证明这位巴克斯爵士的描述和留下的日记大都是他想象的产物，而非新闻记者由亲眼目睹和采访开始的记录。

接下来是对革命和变革的描述，这些描述来自于记者或者那些亲身参与了中国大变革的人们。来自西方的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扮演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的角色，他们的回忆录都是那个时间段对中国最好的描述，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史迪威将军的日记或者是约翰·戴维斯的作品《抓住龙尾》。更为精彩的是那些记者们的描述，抗战时期聚集在重庆的记者中后来成就了不少明星。他们中声名最显赫的包括《纽约客》的记者项美丽，她写过宋美龄的传记，并且和一位中国作家传出不大不小的绯闻，以及《时代》杂志的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中文名为白修德的怀特是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他却没有成为历史学家，而是选择成为一名记者。他让《时代》的创始人亨利·卢斯既得意又头痛，得意的是怀特总能让《时代》在中国报道上领先一筹，头痛的是怀特不愿意赞同卢斯对中国的观点，无保留地拥护卢斯的挚友蒋介石将军。

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怀特统治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他之前，曾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给美国人讲述关于中国的传奇故事，中国的农民如何依恋他们的土地，而中国的妇女又是怎样生活在深深的庭院之中。而怀特则一本正经地讨论美国失去中国的过程，他的著作《中国的惊雷》成为畅销一时的作品。他在书中描述出一个无能的军队和无能的政府，让美国人震惊自己的盟友竟然是如此糟糕。“我们在与僵尸结盟”，他在《中国的惊雷》中说。此后，历史学家黄仁宇不断提及怀特对中国的描述，不断在用自己的研究和他的大历史理论来试图揭示国民党政府崩溃的更深层次原因。他甚至给怀特写信，同他眼中的这位大作家探讨中国问题。他在历史课堂上最头疼的就是怀特加给美国学生们的中国印象：“国民党政府因为自己的腐败和无能失去了中国。”

那些没有留在重庆，而是转身走入延安的记者中也诞生了炫目的明星。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让他成为中国报道领域中名声最显著的一位。正像怀特一直是史迪威将军、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密友，埃德加·斯诺一直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经历了中国对西方的封闭和文化大革命，一直延续到

他去世，他一直被视为中国的朋友。同样的明星还有曾经为朱德写过传记的史沫特莱，以及记下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谁是描述中国的最后一个明星，因为描述中国或者因为同中国最高层的领袖过往甚密，并且因为将中国形象介绍给西方世界而成为中国报道领域的明星？书架上的另一本书或许是一个答案：《江青同志》。年轻漂亮的维特克夫人（Roxane Witke）穿着自己的连衣裙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面容渐老的江青，并且不知道怎么竟然得到了采访江青六十个小时，并为她写一本传记的机会，“我从没有跟一个外国人谈过我的过去，你是我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因为我听说你很想了解这段历史”。历史没有让维特克成为斯诺。她是短暂的明星。

继维特克之后，在《纽约时报》办公室政治斗争中失利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Harrison Evans Salisbury），一名被排挤的副总编辑开始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记者。他穿行在东亚，跟政治家交朋友，进入媒体报道的荒野。他 1985 年出版的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是一本得到中共高层配合的畅销书。他和邓小平交谈，是邓朴方以及一些中共高层的挚友。他描述一个刚刚开始新的变化的中国，也免不了谈论人们感兴趣的政治内幕。但是他还没有将中国作为一个奇迹来描述。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的西方作家和媒体记者还没有意 识到他们面对的中国，仅仅是在一个会超过三十年高速增长的初期阶段。书架上的另一本书名为 《苦海余生话中国》（*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它出版于 1982 年，作者是《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包德甫，他仍然着迷于描述一个刚刚从创伤中恢复的国家和它的人民。

中国在西方公众世界中的形象从何时开始变成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起初它是一个马可·波罗描述的遥远的黄金国度，接下来是莫理循和巴克斯笔下的等待开拓的新疆域和猎奇故事的发生地，然后是二战时期的东方大国，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进行着坚忍顽强的抵抗，中间伴随着赛珍珠和林语堂营造的优雅、古典、乡土中国，接下来，是一个封闭的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让人好奇，是 20 世纪 60 年代青年幻想的国度和冷战时期的绝对敌人……它的形象何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和新的经济奇迹呢？

至少在 1997 年世界银行在总结东亚经济奇迹时，仍然没有将中国的发展纳入其中。后来，不少人争辩说这是世界银行在当时最大的失误。可是在 2001 年，我们就看到了这本《中

国：即将到来的崩溃》。至少在中国媒体口中，章家敦的这本书成为了“中国崩溃论”的代表之作，也成为反驳的对象和轰击的枪靶。

在这本 2001 年出版的书中，我们能够看到并不陌生的语调。章家敦在这本畅销一时的书中说：“基于已有的事实，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将会先统治亚洲，然后在不远的将来统治世界……表面看来，在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的 25 年之后，今日的中国强大而富有戏剧性，但事实上，中国是只纸老虎。表面的宁静之下，是个脆弱的中国。”

在其中的一章，章家敦描述说，当他的父亲站在上海浦东的世界第三高楼上，望着窗外辉煌的灯火时，从 20 世纪 40 年代就开始离开中国大陆，并且无数次的预言中国大陆必然面临危机的父亲突然扭转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认为自己目睹了一个正在强大的国家，富有并且仍在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是章家敦却要展示这表面繁华之下的千疮百孔：革命事业变成了请客吃饭，“革命已老”；国有企业在垂死挣扎，“美国有克莱斯勒，中国则有无数的克莱斯勒”；共产党准备好应对互联网的挑战了吗；中国国有银行体系将会面临彻底的失败，纷纷沉没；国家会抑制不住自己去压抑和攻击那些私有企业；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茫然无知行走于高速公路上的女孩一样，身处危险，随时可能面临致命的停滞；甚至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可能对中国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它用严格的时间表来要求中国更加开放。

他忧心忡忡地说：“政治领袖们将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原则，为了维持稳定，党会阻止那些将会拯救中国的变化发生”，可是“变化却是必须的。”而且，“如果经济困境仅仅是经济困境也就罢了，它还同政治缠绕在一起”，“到了某一时点，将不再会有解决方案。经济，还有政府都会崩溃。而我们距离这一时点并不遥远。”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说过，“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能够解决继承问题”。章家敦说：“当 2002 年、2003 年权力交接时，所有事情都可能发生。”

站在 2010 年再来读章家敦这本书时，我们内心难免会涌现出一种奇怪的情感。新世纪的最初十年已经过去，我们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即将到来的崩溃”。恰恰相反，很多人看到的都是这个国家玫瑰色的那一面。我接触的许多企业家都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最好的时代。过去的

十年中，中国的民营企业真正得到了发展，联想和沙钢都曾经进入了《财富》世界 500 强排名，一些中国品牌也在不断发展，开始广为人知，比如华为。

尽管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国资委的成立和登陆资本市场已经让中国剩下的国有企业变成了真正的巨兽，比如，中石化成为全球最大的十家公司之一，中国工商银行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而中国移动是全世界最大的移动运营商。民营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富人阶层，一个数字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当然，百万人民币在这个国家根本不算什么，它甚至购买不了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城市的一套住房。中产阶级可能正在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在不断变得庞大，更多的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时尚和流行文化正在兴盛起来。奥运会刚刚举办完，接下来是世界博览会。中国制造几乎所向披靡。我想我不再需要重复这些溢美之词。过去的两年，正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政权建立六十周年，已经有无数的图书和新闻报道讲述了这些故事。

我们听到的是赞美中国的大合唱。当然，不断地有新的作品来给西方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其中有极端的反对派，比如法国政治家和作家索尔孟出版的《谎言帝国》，描述 2005 年的中国。但是大多数的作品都开始尝试着更加客观和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毕竟，首先得接受中国正在崛起这个事实，而且在崛起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遇。更多的作品，即使是在尝试着去揭示中国荣光之后的阴影，也开始小心翼翼，不再有全盘崩溃论的宏大叙事。

《泰晤士报》的记者 Oliver August 试图通过描述赖昌星的命运来描述中国图景，他在 2007 年出版了名为《红楼之内：追踪中国最想要的人》。一个曾经辉煌后来没落并流亡的中国大亨，成为他选择的切入点。Alexandra Harney 的《中国价格：中国制造的真正成本》和莱斯利·张的《工厂女孩》试图展示所向披靡的中国制造背后的真正故事，但是其中的故事在中国人看来其实也属老生常谈：我们还需要一个外国人来告诉我们血汗工厂的残忍和廉价制造业对环境的污染吗？我们就生活在其中。《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的书则把目光对准他寻找到的中国当代英雄，比如程益中、蒋彦永等人，维权律师、黑幕报道者和直言不讳的医生、作家与电影导演都是他描述的对象，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描述，在他的书《走出毛的阴影：为新中国的灵魂奋斗》中，有一章名为“富婆”，讲述一名地产商的故事。《华尔街

日报》记者麦健陆则试图写一本揭示中国商战秘密的书，《十亿消费者》，其中多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征战的案例，它们如何折戟，又如何猎取成功。

“崛起”和“大国”成为关键词，尽管使用这些词语的作家本身可能并不赞同这种提法。他们谨慎地赞美中国，谨慎地指出这个国家的危险，他们甚至可能并不喜欢中国。《金融时报》记者詹姆斯·金奇的 《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和谢淑丽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属于近年来所有描述中国的图书中最好的那一类。前者在他的书中时不时会流露出英国绅士对暴发户所持的那种不屑一顾和忧心忡忡。他书中的一名中国制造商在穿行欧洲的旅途中说：“如果赚不到钱，优美的环境有什么用？好环境可以当面包吃吗？”他将欧洲国家井盖被盗归结于中国对钢铁的巨大需求，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感到不可思议，他抱怨知识产权在中国没有得到保护。谢淑丽则在不吝赞扬的同时试图解析中国的政府机构在如何运作，她努力清晰，但仍然不够清晰。她称它为大国，但清楚看到它是拥有泥足的巨人，因而脆弱。

必须提到的还有詹姆斯·马纳在 2007 年出版的《中国幻想》。《中国幻想》基本上结束了“中国幻想”，不过这可不是他的功劳，而是观察家们抛弃了幻想，接受了现实，并且疯狂地赞美现实。马纳说，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幻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最后会带来政治制度的变化，比如中国问题专家 Michel Oksenberg 在 1996 年斯坦福大学举办的“2010 年的中国与世界”研讨会上说，中国最终会走上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政治改革之路，也就是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之路。而他要提醒那些乐观的政治家和商业精英们的是：你们得注意这种可能，中国经济会继续发展，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原样不变。他抱怨说：每当有中美高层领导人的会面即将举行时，美国国内的权威中国专家们都会跳出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醒我们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着多少困境；可是每当中国官方在人权问题或新闻自由原则上违反了西方准则，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又全都通通消失不见。

不得不承认，马纳不是个友好的家伙。不过他的牢骚却变成了真实发生的事情。他在 2007 年的著作中抱怨道：“比尔·克林顿曾经提醒中国领导人说，你们没有站在历史这一边。但可能历史站在了中国这一边，中国成为保持中央集权但同时又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率的地区。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对政治权利毫不感冒。中国似乎要变成一个繁荣的集权国家的样本。”当一个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机构提出如何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时，詹姆斯·马纳马上尖

锐地讽刺道：提到“融入”时，我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谁融入谁的问题。中国融入世界，还是世界融入中国？

但是，每当有人针对这个美好的前途无量的国家镜像提出质疑时——中国的另一面可能不那么精彩，每天都有悲惨故事发生，那些美好镜像的营造者就会拿中国的过去作为辩护：过去要糟糕得多，我们且看一看中国取得了多么显著和巨大的进步吧。马纳说，这是一种“文革底线说”——过去太糟糕，无论如何都显得今天进步多么迅速。

对民主的关心程度也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有了一些新的名词和概念。比如，中国问题专家们不再会说“中国没有民主”，而是 “中国没有美国式的民主”或者“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言下之意是中国在发展一种新的民主模式。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则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政府治理”这个名词。“党内民主”同样是另外一个作为对民主的替代的名词。

这种大合唱的高峰是可以预计的，而且今天我们已经无需预计，因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比如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出版的两本书，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和政治学者马丁·雅克的 《当中国统治世界》。章家敦一定难以想到，在他的《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出版之后的十年，竟然真的出现了一本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在这两本书中，马纳所抱怨的针对中国的幻想不复存在。人们之所以幻想，是因为对现实有所期待。但是现在，一些最优秀的观察家们都开始转而赞美起现实来。

中国目前的独特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不再被当作一种发展中的过渡期的产物，而是当成一种可以加以效仿的新的制度模式来描述。世界最知名的未来学家之一约翰·奈斯比特总结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对“自由”、“民主”等概念都有从中国角度的阐释；而马丁·雅克则争辩说，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我们从没有想到在西方的制度和模式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制度和模式，“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很少想到这两种叫法以外的其他情况”。但是中国与众不同，“中国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国家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世界发挥强大影响力……可以想象，次贷危机中盎格鲁－美国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适用于更多的国家。”“人们谈论现代经济史甚至会使用‘中

国前’和‘中国后’之类的术语”。恍惚之间，我们仿佛真的回到了马可·波罗时代，成为在陌生远人眼中的黄金国度。

（李翔：第一财经周刊总主笔。原文链接：http://www.eeo.com.cn/2010/0304/164195.shtml ）

【返回目录】

10-4 国际先驱导报：书写中国——寻找一个铅字里的国度

“也许，那些关于宏大中国的陈词滥调并不值得深究，但更多的书写者怀有的，仍是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经济改革、社会变化以及人文历史中某个细枝末节的好奇，并以此为动力，出发上路。”

毫无疑问，上个月底闭幕的广州亚运会令中国再次有机会向世界展示了自我。但在围观正成为主题的今天，人们更在乎的一定还有，展示之后，世界将给出怎样的评价。

外国人怎么看？这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文明史中从未停止过的好奇心。而从 700 多年前的《马可•波罗纪行》起，世界便开始了以文字形式作出回答。那么，700 年后，当中国题材的书籍热销全球时，关于中国的答案，也愈发多元。而我们，从这些或激愤或冷静或精细或粗略的铅字里，又会读出怎样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西方文字下的中国秘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今天的世界，无论关于中国的争论如何激烈，总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中国叙事的“眼球效应”。

而关于中国的书籍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并越来越受到关注，也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些从未间断并且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关键词的新书，正悄悄摆上国外的书架。这股近十年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的中国图书全球热，也正带领世界读者集体围观中国。

出版业的“中国效应”

今年春天，华裔作家闵安琪带着她的新作《中国珍珠》到纽约做宣传。闵安琪以赛珍珠为主角的传记小说用心良苦，意图通过赛珍珠与中国女子小柳的虚构友谊打造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史诗。



旅居海外的华裔作家“回头看中国”，英国人保罗•弗伦奇则将目光对准了中国的历史。这个 20 多年前就来到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英国人，2010 年写就了《镜里看中国：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之间的驻华外国记者》一书，通过对中国历史特殊见证人的记录，刻画了在华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

关注东方大国的昨天和今天，事实上，全球出版业的“中国年”两年前即已开始，并一直持续至今。

2008 年，美国出版界出现“中国年”概念，《中国三十年》《中国大趋势》《当中国统治世界》相继面世。第二年，英国出版业龙头剑桥大学出版社亦迎来自己的“中国年”。

在美国，衡量一本书是否成功的最明显标准之一是：它可以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待多久。而新世纪十年里中国题材图书一举打破长达多年的沉默，接连登上排行榜并引发巨大话题，早已不再是美国出版业的“怪现状”。美国驻华记者、自由撰稿人彼得・赫斯勒多年前出版的两部纪实性作品《消失中的江城：一个西方作家在长江边城的两年》和《甲骨：流离时空中的新生中国》，至今仍在多家图书销售网站出售。该书由哈泼・柯林斯公司出版后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者本人也因此一举成名，被认为是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题材书作者之一。

随后美国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于 2007 年推出女记者萨拉•邦焦尔尼的《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上市后，没有悬念地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继而，美国许多出版公司开始设立专门出版中国图书的部门，包括企鹅、哈泼・柯林斯、兰多姆等。

而在英国，走进大英博物馆对面的阿瑟・普罗布斯塞恩书店，你会发现这家百年家族老店里的中国题材图书藏书量非常可观。在店主迈克尔・谢灵厄姆的记忆中，过去整个英国关于中国题材的图书少之又少。而现在，书店为客户提供的新书目录上就列有 150 种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在网上同时销售 400 种。据说，著名英国文学代理商托比・伊迪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文学代理生涯结束时能用 10 本书改变英国读者对中国的看法，让公众换一种方法思考问题。

关于中国的书，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本？这个问题几乎令人无法作答。因为，在每天浩如烟海的新书中，作为一个关键词，“中国”二字所聚集起的人气早已不再是一组单纯的数字，它还代表着好奇、猜测、印证、话题乃至争议。

正读与误读的标签式写作

尽管质量参差不齐，作者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也莫衷一是，但对西方乃至对中国本身，这些书籍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干预力。

这种干预力，多半取决于内容上的价值衡量。而在一切速食的现代文明中，“标签”完全有理由成为另一种快捷的图书鉴别方式。例如那些总是从宏观角度出发以缺少严谨性的大词汇来描绘中国的书籍，便被西方学者把统称为“Big China Books”（大话中国书）。近些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秘密世界》《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在改变世界》《中国震撼世界》 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甚至除英文以外，以其他主要欧洲语言甚至是非洲语言出版的书籍也纷纷面世，如《强大的魅力：试析中国软实力》等。

也许，那些关于宏大中国的陈词滥调并不值得深究，但更多的书写者怀有的，仍是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经济改革、社会变化以及人文历史中某个细枝末节的好奇，并以此为动力，出发上路。伴随这种田野式调查的，是面向一切的发问：中美关系、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环境污染、知识产权、民主化进程、公民社会和人权问题……他们所深入体验的，是一个独一无二而又千百种面目的中国社会。彼得•赫斯勒的《消失中的江城》和《行过城乡》，罗布・吉福德的《中国道路》，张彤禾的《工厂女工》，迈克・迈耶的《老北京最后的日子》等，堪称此类中的经典。

说来有趣，整个 20 世纪里，西方人的中国喜好大多源自他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的求知欲，另一种兴趣则出于对“黄祸论”中“傅满州博士”或小脚女人的好奇。一个典型的例子恐怕要属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却写出一本《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描述 19 世纪中期一个中国人寻死却不成的悲喜剧。据说，开始动笔前，这个素爱冒险和幻想的作家大量恶补关于中国的知识，主人公“金福”的名字以及大量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细节显然便来自于此——在纯粹的想像中，他塑造了一个遥远、神秘而破败的异邦。



另一方面，即使是信息趋于公开透明的今天，中国“黄祸论”依然有着足够大的市场。这种近乎阴谋论的恐惧造成了另一种唱衰中国书的存在，从《在龙的利齿中：美国面临中国强权时代的命运》、《中国令我担忧》甚至是《中国即将崩溃》中，都能看到一种危言耸听式的悲观论调。

探寻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秘密

文字可能掩盖真理，但也不能否认——如果不是出于恶意——利用文字寻找理性的行为本身就拥有一种尊严。

就像那本著名的《内裤从哪里来？——一包内裤看中国》。

一切的开始都如此偶然。在新西兰的商店里用 8.59 新西兰元买了一包内裤之后，作家本尼特长途跋涉来到了中国的一片棉花地上，然后把身上的衣服脱到只剩一条内裤。本尼特看着手中这包中国制造的内裤，深深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无法想像生产一包内裤的成本竟然可以这样低。从棉农到织布工，从橡皮筋厂到制衣商，从出口公司到本地分销商，经过了层层的利润加成之后，5 条内裤的价格怎么还不到 10 新西兰元？

本尼特决定来到内裤生产的源头，亲自去发现这个国度的秘密。

他探访了中国上海、泉州、义乌、温州等地的工厂，还有新疆的棉田。随着这包价值 8.59 新西兰元的内裤背后的故事渐渐展开，本尼特见到了一个让他吃惊不已的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

同样是观察中国经济，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沃茨则选择以儿时的疑问为起点：当十亿中国人同时跳起来，地球会发生什么？

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乔纳森•沃茨第一次向人询问关于中国的事情：“中国有多少人？”然后，他听到“如果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地球将偏离轨道”，为此，他长时间忧心忡忡，甚至每晚睡前祈祷还要加一句“不要让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那时，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来到中国，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 7 年。

2003 年，乔纳森来到中国，儿时的疑问再次浮上心头：“我发现，十亿中国人真的一起跳起来了——他们都选择了西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那么，后果是什么？沃茨几乎跑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追踪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事件和人物，从山西的非法煤矿，到白鳍豚、藏羚羊的消亡，再到广东省的垃圾处理厂，乔纳森的足迹最后凝结成《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一书。

“旅行”只是这本书的外壳，《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的真正内涵在于，它通过生动的一系列新闻故事和旅行见闻提醒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以及环境污染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伤害。

那些打量中国的眼睛

每一个来到此地的人，这个国家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教他们更多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相对散乱的群体，准确的说，是许多个个体的集合——自我视角赋予体验式写作者独一无二精神触感的同时，也注定了他们每一个人在探索中国时的孤独与无处诉说。书写者之间可能很少相似之处，但从开始选择同一个观察与写作主体，他们之间的孤独便注定无法分割。

从传教士开始

如果硬要从繁如烟海的中国题材中挑出一本，大多数人的选择将会是《中国人的人性》。这本著于 1894 年的书，出自居留中国 54 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阿瑟・亨德森・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之手，至今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并得鲁迅、潘光旦、费正清等先后力荐。在这本全面剖解中国人人性、民族性乃至为国家悲剧命运“立此存照”的书中，作者毫不避让、弯刀剔骨的目光所折射的力量，至今令人震撼。

而更值得说的，是作者的传教士身份。从明朝晚期以来，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文化交流史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恰恰能够在《中国人的人性》一书中求得解答。笼统说来，传教士们所能行走的距离和所能体察到的中国内部，注定了这一群体在中国国门尚未开启之时，所扮演的超出其角色定位的戏码。



在对于传教士于中国历史中的存在研究中，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张西平发现了一些让他吃惊的信息：400 年前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曾把《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出版；中国第一本英汉词典《英华字典》是 200 年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写的，厚达 3700 页；17 世纪传教士的著作《中国图说》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

“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往往是他母国关于中国的第一本书。这些书是中西文化相遇时最生动的资料。”张西平说。

事实的确如此，在另外一本关于美国最早来华传教士传略《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中，读者便能读到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中，经济和宗教机构的利益关系、英美各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利益关系、《圣经》的翻译过程中日益凸现的教派间的冲突……这几乎是一本关于道德家、政治家、外交官、神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汉学家的书。

有趣的是，当传教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力量分支近乎巧合地延伸到这些标签：道德家、政治家、外交官、神学家、历史学家、汉学家以及作家，直至新传媒世界里那些无所不能的记者身上。

更多元的观察

当中国陷于深重的民族苦难，法国作家绿蒂的《北京的陷落》和英国作家毛姆的《在中国的屏风上》，无疑算是作家从传教士手中接过火炬，继续致力于行走并记录中国的另一种尝试。

而当资讯时代的来临，西方新闻机构开始意识到东方的觉醒与记录这种觉醒的必要，于是，越来越多的记者来到这里，开始用全然不同的书写介入当下的中国。

2001 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华记者罗布•吉福德即将调离岗位，美国的编辑问他是否愿意去耶路撒冷做记者。他考虑许久后说，算了。那个时候，他已经预计到，在耶路撒冷报道巴以冲突将会是在一个循环往复的百年故事里打转。他告诉编辑，中国，相较之下，她的故事有一种线性的发展，一直通往一个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某处。

之后，罗布有了在中国的长达 6 年的驻外任期。离开中国之前，罗布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在两个月时间内，沿着国道 312 线自东向西 旅行。他从上海出发，直至抵达哈萨克斯坦边境，最后完成了一段 4800 多公里的背包客之旅。这是他与中国的告别之旅。在这告别中，他发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国度。

《中国之路》讲述了这段旅程，实际上它也是思考和探索中国问题的一份田野调查报告。罗布在书中说："在中国的多年生活中，我同许多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交谈，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都在给这个国家问诊把脉，并能够把它解释给外国人听。有时他们确实做得很好，但如果真的想了解中国，真正的中国，没有比和一个开长途车穿越戈壁大沙漠的司机长谈一番更好的方式了。"

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到长途车司机，这是美国记者罗布得以看到的中国面孔，绿皮火车、大卡、徒步，这是罗布在中国大地上的漫长前行。然而在这片土地上，罗布并不孤独——几乎每一个驻华记者的心中，都有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愿望。

中国教会他们的事

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人，都或多或少为中国的速度和能量所震惊，但中国人"教会"他们的事，却绝不仅仅如此。

关于"中国经验"，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保罗·米德勒（《中国不良制造》的作者）的最直接记忆是：深夜，你抵达机场，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爽快答应 20 美元带你去酒店。 行至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司机停车，要求加 10 美元才继续走，不然不收你钱你自己下车。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后来，保罗常用这一案例来比喻中国人在生意场甚至是中外贸易中的表现。

《内裤从哪里来》的作者乔·本尼特在来中国之前，很清楚如果坦露自己作家（记者）的身份，很可能会受到额外的阻挠，因此，他给自己"伪造"了一个身份：在中国期间，他是新西兰的内裤商品大买家。罗布·吉德福同样坦言，常年的中国工作和生活，他已经学会对自己的言谈举止养成自我审查的习惯。

而曾著有《当东方遭遇西方》、现于清华大学政治系任教的美国人贝淡宁，被该校学生邀请参加一个以民主为主题的讨论会时，第一反应便是：这不会是个陷阱吧？

每一个来到此地的人，这个国家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教他们更多。

彼得·赫斯勒：寻路中国

住在北京，却从不写北京，而是对农村和小城镇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在赫斯勒看来，“北京不能代表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关注中国的英文读者应该不会对彼得·赫斯勒感到陌生——他的书摆放在美国大书店的中国区，《纽约客》《国家地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报刊上也常有他关于中国的长篇报道。这个中文名为何伟的美国作家第一次引起中国人关注，是 2006 年由台湾出版的中文版《甲骨：一次穿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旅程》。

中国是第二故乡

彼得·赫斯勒最近一次来中国，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那时候虽身肩《纽约客》繁重的写稿任务，但他仍抽空去了北京怀柔的三岔口村和东城区菊儿胡同。

至今，三岔口村依然有他长期租住的房子，每两三星期他会给当地村民朋友打电话问候近况。“我已经在中国住了 10 多年了，跟中国有着长期的关系，虽然明年我会去中东，但五六年后会再回来中国，因为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特别是在涪陵、三岔的朋友，中国差不多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6 年，作为美国政府资助的志愿组织“和平队”第三批派往中国的志愿者，他在成都培训两个月后被派到重庆市涪陵师范学院“支教”。赫斯勒回忆说，作为涪陵仅有的两个外国人之一，他买东西的时候经常遭遇围观，“老外”、“洋鬼子”一些不礼貌的称呼令他很不舒服，但这也迫使他不得不主动跟中国人接触，进而在此后的 10 年里得以用笔来记录飞速变化中的中国。

结束两年“支教”后，赫斯勒回到美国半年，根据这段生活经历，他写了《消失中的江城：一个西方作家在长江边城的两年》，并委托代理人费尽周折得以出版。2001 年，这本书获得诸多奖项。

“《消失中的江城》给了我自信。”满载信心的他在 1999 年春天重回中国，先是在《华尔街日报》做记者助理，工资不高，工作辛苦，他慢慢熬过来，“6 个月之后，我的文章卖得多起来，《国家地理》、《纽约客》都要我的文章，那时我决定做自由撰稿人，我不要稳定的工作，不然没有时间写书。”他给报刊的文章每年不过三四篇，更多的时间用来写书。

2006 年出版的《甲骨：一次穿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旅程》，记录了他从 1999 年到 2004 年接触到的许多故事、人物、事件，各种纷繁的线索被他娴熟地编制成一幅当今中国的“清明上河图”。

写普通人更有意义

1999 年，赫斯勒初次到北京，住在东四十条的一个小房子里，2000 年搬到菊儿胡同，一住 6 年，2006 年到 2007 年搬到雍和宫，同时，从 2001 年开始常常到三岔口村住一段时间。

住在北京，却从不写北京，而是对农村和小城镇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在赫斯勒看来，“北京不能代表中国”。

“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新增的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需要学习很多新的技能来适应城市生活，有名的大人物不如他们有意思。一开始，他们因为你是外国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并且不把你当外人看了。他们的务实让我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总是通情达理。”在这个美国人眼中，比起出名的大人物，书写那些在二三线小城镇里生活和奋斗的人们显然更有意思。

今年，赫斯勒的新作《寻路中国：从农耕到工业中国的旅程》源于他的三次长途自驾车旅行。2001 年和 2002 年，赫斯勒在中国拿到驾照后决定去青藏高原，于是开车沿着长城往西走，从山海关出发，途径山西、内蒙古到陕西榆林，终于到达青海湖，他走走停停，一边采访一边给路人提供便车，耗时两个多月。2005 年，温州到金华的高速公路贯通后，赫斯勒租车

从温州出发，走遍浙江的小镇。 这些对中国中小城镇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关注，也勾勒了《寻路中国》的雏形——高速公路对于中国城镇发展的影响。

《寻路中国》共分三部分，“书的结构是先写农村，再写到城市，这跟中国现在社会变化从农村到城市的进程类似。”赫斯勒说。

采访中，当本报记者告诉赫斯勒，有位中国读者正是读了他的《消失中的江城》才决定去从事 NGO 工作。“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不错的影响。我很满足了。”他显得有些惊讶。

美国人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自由撰稿人、作家，这三个身份中，你最想做哪个？

彼得·赫斯勒：作家吧，哈哈。我比较重视写书。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学过写作，那时候我喜欢小说，而我又比较喜欢采访人，喜欢研究。但我并不喜欢记者的工作，因为记者的写作没有创造性，文笔也不漂亮，工作节奏很快，压力很大，过于注重新闻重要性和时效性。中国是个特别的地方，这里的新闻跟普通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长期的改变过程。要告诉别人现在的中国是怎样的？必须告诉他们这个长期的变化过程。

Q：你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写作对象？

A：选择一个地方呆一段时间，例如两年内我去了十多次浙江丽水，经常跟当地人见面和聊天，最重要是时间，去很多次才能了解这个地方。

Q：概括来说，你所有的书写中国的文字，围绕的主题是什么？

A：主题都一样，向美国读者介绍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同时也是（介绍）好看好玩的，有意思的新东西。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中国人现在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最看重的是哪些东西。

Q：美国普通人眼中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A：美国也跟中国一样领土辽阔，因而也比较封闭。一般的美国人很少旅行，都不怎么了解中国，只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们不喜欢中国，还是冷战思维，觉得中国特别不好，完全不自由。但那些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们每次都问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新闻是重视政治，不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但情况也在好转。1999 年我的代理人联系出版社，只有两三家签了我的书，他们说："中国没意思，我们的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而现在，读者比较欢迎这类书，2006 年《甲骨》非常顺利地签约了，《江城》有 15 万册，《甲骨》超过 10 万册，新书《寻路中国》还不知道销售量。

Q：对你而言，今天由一个外国人来书写中国的意义在哪里？外国人写中国与中国人写中国有何不同？

A：我写的很多东西，中国人习以为常，他们可能觉得没意思，例如我写一个女孩如何跟她的老板就工资讲价，我觉得很新鲜就写进书里，但中国人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我比较喜欢描写细节，如果要给美国人介绍中国是什么社会，细节很重要。

Q：那你觉得自己了解中国吗？

A：这很难说，中国很大很复杂，我对中国一部分了解，一部分不了解，我对涪陵和三岔还比较了解。

Q：你如何看待以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为代表的世界对中国的赞叹？

A：他们有点夸张了。中国肯定在未来很重要，现在主要是经济上的崛起，但是精神的重要性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还不够成熟。

今天他们写的，百余年前都写过

【作者】丁扬

从数百年前的传教士到今天的驻华记者，在这前仆后继始终未曾断裂的书写脉络中，那些社会乱象、腐败、国人精神的麻木，并未随时间而消失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也许，任何以国度为名义的写作，多少都带有唐吉·诃德式的荒诞与悲壮——单薄的己力，细小的文字，一个人犹似一支队伍，书写之苦与辛酸，就在于这蚍蜉撼树般不自量力的对峙。

至于被书写，那总是一种莫大的荣光。反观我们的国度——以其五千年悠长而无法摆脱的沉重过去和奔向新生的迅疾姿态，中国毫无疑问值得任何磅礴或者精细的描摹，当然，她理应亦无惧误解、批判和愤怒。

然而，从数百年前的传教士，到今天的驻华记者，在这前仆后继始终未曾断裂的书写脉络中，国人面对外来目光是否更自信？面对被塑造的种种自我，是否更从容？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所苦苦寻找的、关于中国的谜底，历史是否已经给出答案？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即《中国人的人性》)来，把这本书当成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 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这是多少年前，鲁迅在《“立此存照”(三)》中关于《中国人的人性》一书的独白。

这是一本颇为神奇的书。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刻画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人性，更在于百年后的今天。面子、忽视公共精神、缺乏信仰……以及文中某处“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民族”，类似的剖析与审视俯视皆是，而这些“气质”，能令大部分人联想的，绝非鲁迅的糟糕时代，而是今天的、狂奔在 GDP 道路上的当下中国。事实上，回过头翻一翻那些最初的中国纪事——当年传教士们的手记、作家毛姆的《在中国的屏风上》等——那些社会的乱象、腐败、国人精神的麻木，并未随时间而消失。

这么说来似乎有些悲哀，因为无论怎样新的身份、新的调查方式的写作，事实上，他们所写的，一百多年前已经被这个传教士写尽；而我们所读的，也仅仅是一个在本质上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中国。一个民族的习性与命运——这也许就是历史给出的答案。

由此，现代书写中国的意义何在？这真是一个令人倍感虚无的问题。写作本身从来不应具有概括一个民族的野心，无论你的出发点带有怎样预设的立场或者企图， 任何虚妄的赞美和预言都只能沦为时代的花边。写作本应是细部的描摹和勾勒，优秀的作家和记者明白这一点，所以，你看那些被长久传诵的故事，从来都是微小的、个体的细节，正如读完《中国人的人

性》，你能清清楚楚看到每一个面孔，翻开彼得·赫斯勒的《消失中的江城》，你翻开的就是一座被淹没城市的命运。

当然，每一个精彩的故事，都在指向本质。

（杨梅菊、陈雪莲：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原文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0-12/08/c_13638361.htm ）

【返回目录】



【媒】

10-5 许知远：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不过，他对于中国的兴趣从未减弱，因为身处美国，他的中国人意识增强了，而且获得了另一种观察角度。他读定期出版的“中国新闻”，它们是由一群耶稣会的神父们收集整理的，这些葡萄牙人在香港、澳门收听中国的广播，而且能够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他们把毛泽东、林彪的讲话翻译成英文。”



一

刘香成第一次明确的身份意识与红领巾有关。那是 1957 年的福州，6 岁的刘香成是鼓楼一中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小学生胸前佩带的红领巾，是这个 1949 年建立的新国家表现自己“先进性”的诸多努力之一，也像很多事物一样，它来自于苏联的影响。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后，东正教传统中小孩子的“主日课”时的红领巾，摇身变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少先队的标志。自 1917 年以来，苏联的道路为饱受羞辱的古老中国，提供了意外的选择。

班里几十位同学中，刘香成是唯一没有佩带上红领巾的。“就像全红中的一点黑，黑就是我”，多年后，刘香成回忆说，“这也是我领会到新中国的制度的开端。”

阻碍这条红领巾的是刘香成的出身。原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了，在乡村，贫农批斗地主、分了后者的家产，在城市，资本家被打倒，一种求新的观念弥漫在社会气氛中，人们或许尚不清楚该拥抱的新价值观是什么，却知道需要抛弃所有的旧思维、旧秩序。鼓楼一中小学位于福州军区的北门，它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军队干部子弟，他们是新秩序中最上层的群体。

出生于 1951 年的刘香成，算得上是典型旧秩序的后代。他的一位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中国历史上，他的名字除去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紧密相联，他还曾挪用了部分



福建马尾船厂的经费来修建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他还拥有中国士绅阶层对教育的热心，在他创办的一系列学堂培育出众多学生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梁漱溟。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则是失序的民国年代中自我奋斗青年的缩影。他的出生地湖南的湘潭，山清水秀却很贫穷。读书、当土匪，或者从军，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三种方式。刘季伯幸运的成为一名将军的助手，并被送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培训，毕业后他先是成为蒋介石的福建省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然后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小姐叫陈伟雯——陈姓大家族的一位小姐。

这桩地位不对等的恋情，最终成就了婚姻。他们住进陈家赠送的一座四合院里，邻居中有一位叫严家淦，当蒋介石 1975 年在台北去世时，他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稳定的生活没有持续多旧，混乱而焦灼不安的 1949 年到来了。刘季伯夫妇没有听从严家淦的建议前往台湾，他选择了去香港，这个南中国的殖民小岛拥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对新秩序心感不安的商人、官员、知识分子、黑社会和普通难民。在那里的他又意外地成为《星岛日报》的社论作家，为他牵线的则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也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一样，刘季伯的民族情感远远高于党派之争。他在 1950 社论中，他将新中国比喻成春天的到来。

刘香成出生在 1951 年 10 月的香港，是这对夫妇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3 年后，他的母亲抱着他又回到了福州的老家，因为刘季伯相信“教育还是大陆好”，香港只是个小渔村。

福州那座四合院在 1954 年时不是私有财产了，从居委会主任开始，好几个新住户搬了进来。不过还有几间留给了刘香成和他的母亲。

在刘香成懵懂的童年岁月里，中国发生着眼花缭乱、深刻的变革。在国际上，她已在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中战胜了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她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重要的国家；而在国内，它要更改持续了上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心理，她发动了土改，解放了妇女，镇压了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将党支部建立到每一个村庄。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毫不迟疑的进入人的内心。人们检讨自己，揭发别人，热情高涨的投入集体生活，长期受困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正在被锻造成同一种力量、同一个声音。当然，牺牲者经常被忽略掉，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一致的声音，就会被隔离，被视作异端。



6 岁的刘香成是如此渴望变成这一致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他有个那样的家庭，而且是出生在香港的华侨。

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开始做出别的努力。在每个星期三捡石头的义务劳动中、在挥舞着扫把到处赶麻雀的活动里，他特别积极。“我打苍蝇比谁都起劲”，他说，“我的苍蝇都是满盒满盒的交给班主任的。”但是他的成绩单里的政治表现一栏从来只是两分、三分，满分是五分。

不过，出身并非全是坏处。人民公社与大跃进运动之后，饥荒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刘香成没目睹过大规模的死亡，却记得城市里的饥饿对人的摧残。他看到没有粮食、没有油水吃的邻居，浑身都水肿了，还有一个人拿着一条发霉咸鱼去做一碗很大的汤，出来的就是骨头，已经没有鱼了。他还记得，当街道杀一头猪时，所有人都会去排队去买猪肉，他排了好长时间买了二两的猪肉，全都是肥肉，大人告诉他肥肉是照顾你，人们都不想要瘦肉，没有油水。但在香港的父亲寄给家里外汇券，可以到特别供应店里去买黄油、食品，所以，他没有太深的饥饿记忆。

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感到了 1961 年终于结束了。父亲希望他回香港，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浪潮不知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席卷多少人，香港与内地的流通也日益困难，小小的罗湖口岸越来越具有政治意义。

刘香成的离开，变成了学校的新闻事件。在那个准备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年代，出国是件稀奇而重要的事。校方特意召开了全校大会，所有的同学都站在操场下，观看刘香成戴上红领巾。

二

当刘香成向我讲述起福州的四合院，去追赶麻雀的时光，还有红领巾带来的焦虑时，阳光正穿过木棱的窗户打进屋内，他的银白头发亮亮的。那台同时可以放八张唱片的唱机的扬声器中正传出“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悠扬女声，时空一下子错乱了。

我们坐在距离北京景山公园不远的一个四合院里，它 400 平米的面积比不上福州的那一个，但在日渐面目全非、被巨大钢筋混凝土建筑挤压的北京城中，它散发出北平式的悠闲味

道。当 1994 年买下这个院子时，刘香成准备开始一段人生的新旅程。他之前的体验丰富、却路径清晰。他是华人世界最知名的摄影师之一，为《时代》、美联社这样的世界最富盛名的新闻机构工作过，还经常被冠予“第一位普利策新闻奖华人获得者”——尽管那只是一项集体性荣誉，它在 1992 年被授予……

我是在 2001 年 2 月第一次见到刘香成，那时他是新闻集团中国区的高级副总裁，自 1994 年决定搬到北京后，除去他创办过一份寿命短暂的《中》月刊时，为《时代》拍摄过江泽民 1997 年访美的一组照片外，他逐渐告别了一线的新闻业。 他先是成为了时代华纳集团的北京首席代表，促成了财富论坛在 1999 年上海的召开。接着，他又加入了澳大利亚人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其想进入中国市场勃勃雄心，疏导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的形象在 1990 年代末再次发生改变了，革命、社会主义、第三世界这些昔日的政治符号正在褪色，她变成了全球最庞大与诱人的新兴市场，蕴藏着无穷的机会，吸引着人群与资本的蜂拥到来。但是，像两百年前英国人马噶尼到来时一样，这个市场被种种隐藏的、繁复的规则所左右，涉及权力、金钱、阶层还有敏感的面子。这个国家正在为自己的错乱的身份认同焦虑不安。

刘香成发现自己的经历与身份，为了解这种复杂性提供了意外的便利。而事实上，自从福州的古北一中小学起，他就一直在练习不断适应新的身份。

三

1960 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喧闹、动乱、被各种灾难和新观念充斥了年代，它也是老式的华人社会与殖民地统治的混合体。

刘香成自始就没有对香港产生认同感。“广东话我一句听不懂”，他说，他对于六十年香港的气氛也缺乏兴趣与记忆，想必他在同龄的少年中，再次发现自己像个旁观者。他宁愿生活在父亲所构造的新闻世界里。刘季伯此刻是《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也是六十年代香港仍旧活跃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员，他的同事包括闻名一时的新闻人，他的桌子对面就是曹聚仁。

他们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尽管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却流淌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血液——充满忧患意识。他密切注视着国内的一举一动，在内心深处，他们或许也从未认可香

港，相信这不过是暂居之地，他们终究要回到广阔的大陆的。他们穿着整洁的白衬衫，参加红五月歌唱比赛，为中国取得每一次进步而欢呼。但是，他们也感受着国内气氛的变化，那个曾代表“春天”的政权变得让人越来越不安了。毛泽东像挂在中环的中国银行大厦的外墙上，个人崇拜和暴力语言开始流行。新闻也有了意识形态，而作为“进步报纸”的《大公报》是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的，因为“它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而香港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刘香成记得父亲私下的抱怨。事实上，高中的岁月里，他已经对国际新闻了如指掌。“暑假在家时，别人都去玩，他让我把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他来改”，刘香成说。报社印刷机的声响，和油墨的清香，刻入了他少年的记忆中。

所以，当他 1970 年决定前往美国上大学时，自然希望学习新闻。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制止了他，“新闻是实践”，所以他选择了国际关系——这多少也是他翻译了那么多国际政治新闻所致。

1971 年秋天，20 岁的刘香成成为了纽约 Hunter College 的一名新生。比起生活了 10 年的香港，纽约是个更大、更自由的世界。他似乎也从未培养起对香港的情感，即使多年后提起，他也总是用“狭隘”、“工具化”、“经济动物”的词语来形容它，似乎丝毫没兴趣。60 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难民社会”——人们被物质压迫和对国内灾难所带来的惊慌失措所困，没兴趣关心更多。

不过，他对于中国的兴趣从未减弱，因为身处美国，他的中国人意识增强了，而且获得了另一种观察角度。他读定期出版的“中国新闻”，它们是由一群耶稣会的神父们收集整理的，这些葡萄牙人在香港、澳门收听中国的广播，而且能够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他们把毛泽东、林彪的讲话翻译成英文。他读不懂中国古文，就依靠美国汉学家来深入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与社会心理。他有一个学期论文就以中国的法家为题。在中国，做人遵循儒家的思想，但执政选择的却是法家——是这个年轻人对那时中国政治的看法。

但改变刘香成命运轨迹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他一门选修课。他在摄影课上的主要内容是在纽约街头随意抓拍路人，这勾起了他在香港时夭折的艺术探索——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学了几年的油画，却没发现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才能。由这些摄影习作制作成的简易的摄影集，意外的吸引了 Gjon Mili 的注意。这个阿尔巴尼亚人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他与毕加索合作

的“光笔”系列，改变了人们对于观看的态度。鼻梁上架着粗黑框眼镜的 Gjon Mili 建议这个中国小伙子来他工作的《生活》做他的实习生。

刘香成第一份工作的最初 9 个月是这样度过的。白天，他为 72 岁的 Gjon Mili 整理资料，傍晚五、六点时，他们坐在一起，老人家拿来一瓶威士忌，切一块香蕉和苹果，咬苹果喝威士忌。这时候，Gjon Mili 开始指着墙上贴的从报纸剪下的各种图片，告诉这个年轻人，这张为什么好，那张为什么不好，解读事件要比抓住事件更重要。有时，他还把老朋友的亨利·布列松的照片拿出来品评。

“整整 9 个月里，他从来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刘香成说，“但结束时，他对我说，你应该去中国了。”劝他回中国的不止一位，包括一位时代公司的高级主管。他让刘香成在公司图书馆里阅读收藏的所有关于中国的照片，其中最令人难忘一部分来自布列松。

刘香成想回中国像当年的布列松一样记录这个古老国家的变化，但在此之前，还想去欧洲游荡，他才 25 岁，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前往西班牙，正是这个国家著名的独裁者佛朗哥去世一周年，在他镜头里戴红帽子的是佛朗哥的支持者，他们与改革派在街头追来打去。他还认识了社会党领袖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后者是个 34 岁的年轻人，他带着刘香成等一班海外记者一起喝咖啡，给他们谈社会主义，几个月后，他当选为首相，开启了西班牙的民主年代。

刘香成接着前往葡萄牙，跟随着葡萄牙共产党竞选的旅程。“葡萄牙的共产党开着拖拉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就露天烧烤，煮猪肉、做三明治什么，”这情景让刘香成大感意外和有趣，“这跟中国的共产党很不一样。”接着，他又去了法国，他申请临时记者证去拍摄新总理。当他从总理府走出时，看到巴黎街头报亭里全部报纸的头版都是毛泽东的大幅相片，他意识到毛泽东死了，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时刻，他要回到中国。

他上一次回中国还是 1969 年，那时他高中毕业，去广州看姐姐。他住在全广州最好的华侨饭店，房间正对着珠江，在文革中武斗最严重的时刻，一些被捆起来的尸体沿珠江而下，漂到香港的海边，震惊了当时的香港人。他对 1969 年的中国的记忆是荒诞且压抑。他在一家理发店时，那位给他理发的老头突然对他说“站起来”。他回问，“站起来干什么？理发不是要坐着理的吗？”老人家语气肯定，站起来，跟着我读。然后他转身，让我跟着他读毛语录。他

也记得去餐馆时，总有很多人排队，服务员来到桌面上，就把一大把的筷子扔给你，让人倍感压抑。

这一次，刘香成感觉到空气中的微妙变化。他从巴黎赶到香港，再来到广州，准备前往北京去拍摄毛泽东的追悼仪式。但从广州到北京却必须通过中国旅行社才能安排，时间来不及了。就像两年前纽约一样，他把镜头对准了广州的普通面孔。他在珠江岸边看到人们打太极、看报纸。“他们的神态和 1969 年的中国不同了，他们的身体语言表明他们放松了，阶级仇恨减弱了，他们把包袱放下来了”，刘香成回忆说，“我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想要报道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四

我手中这本《毛之后的中国》是 1997 年印刷出版的，是 1983 年首版已来的第四版，它十六开大小、只有 105 页，收录了刘香成 1976 年至 1981 年间在中国所拍摄的 96 张照片。

这本薄薄的书，不仅是刘香成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也有着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理查德·伯恩斯坦在 1997 年的评论或并不为过。“当刘香成中国摄影集在 13 年前第一次出版时”，这位《时代》当时的驻京记者写道，“它立刻被那些理解处于令人惊叹的转型的中国的人们认出，这是 1949 年以来共产党当权以来，这个国家最真实与时刻的照片呈现。”

当刘香成在 1960 结束了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时，中国已决意将自己像铁桶一样封闭起来。在整个六十年代，全世界对于毛泽东进行的实验着迷不已，他们不知道一代中国人其中遭遇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却对于它光辉、充满理想气息的宣传语言难以自持。但中国问题的观察者们至多只能在香港，好奇的打量这个竹帘后的神秘中央之国，以至于费正清诙谐地评论说，自从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派往月球的人都比到中国的多。来自外部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察与记录是如此之少，当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 1972 年获准来旅行拍摄时，像是被恩赐了罕有的特权。

一直到 1979 年中国正式接纳西方新闻社派驻的记者之前，关于中国的描述都是零星的。而且，这些涌到中国的观察者们经常被眼前的情景弄得失去头绪，这个被一致样式、颜色服装的包裹的国家，人们表情漠然，公共场合到处都是空洞的政治标语，在外来者的镜框里或是笔

下，它们可能被轻易贴上标签、被归类。而掩藏在表面下的更真实、情感涌动的世界却被遮蔽了。

但刘香成却真切的感受到了。事实上，他在潜意识一直在为这时刻做准备。“从福州戴着红领巾离开时就开始准备了”，他说。当他 1976 年来到广州时，计划更明确了，“我非常兴奋，我要拍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毛泽东去世时，他只能在珠江边徘徊，1978 年底他作为《时代》首任驻京摄影师，可以到全中国拍摄了。他儿时的情感体验，他通过汉学家的著作进行的知识积累，他与 Gjon Mili 在午后进行那些似懂非懂的交流，在美国与欧洲游荡经历，如今似乎找到了一个汇聚点，更重要的是，他还拥有年轻艺术家的敏感，他能洞察到细微的变化之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戏剧性变化。

他看到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高举拳头的批斗“四人帮”的舞蹈，在已折皱的毛泽东墙画下端着大碗吃饭的老人，身穿军大衣举着可口可乐瓶子的年轻人，坐在故的广场上的双手抱在胸前的溥杰，戴着墨镜的小镇青年，左手抚摸着爱人大腿的公园情侣，帖满大字报的西单民主墙，举着“要艺术自由”的头发零乱的艺术家，站在主席台鞠躬的邓小平、赵紫阳与胡耀邦……毛泽东的形象，经常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他的镜头中，有时是一副画像，有时是几枚纪念章，有时是一个巨大的雕像，更多时刻，他没有亲自现身，却让人时时感到他的存在。

这个国家正从阴影中走出，开始学习或者重温很多事物，他们大口的呼吸，跳不是忠字步的舞蹈，把头发烫成弯曲的形状，练习在公开场合接吻，滑旱冰取乐，创办私人的企业，对着奇怪的广告牌出神……

那是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或许色彩仍旧是灰暗的，物质仍是匮乏的，但是空气里却飘荡着希望，像是一个漫长冬日后的初春。

刘香成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把握这些变化。他有局内人的体验，却又有着局外人的敏感。他的外表与性格也帮助了他，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你是这样的面孔和皮肤，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操什么样的语言、属于哪个国籍，你永远都是中国人，他们可以更容易信任你。刘香成就这样在各个地区旅行，好奇的打量一切。Tiziano Terzani 是当时《明镜》周刊的记者，在他记忆中，刘香成经常开着那辆有挎斗的军绿色摩托车，不知道他是怎样搞到这军人和警察专

用车子的，因此他不用像其他外国记者一样必须坐外交部指派的车辆。“……他不为人察觉的骑着车，站岗的士兵有时还向他敬礼”，Tiziano Terzani 回忆说。

他那一贯的幸运也从未离开他，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来自西方的新闻记者在中国是个特权阶层，他们可以享受到优越的物质生活，还可能和本地最杰出的人士成为朋友。他 30 岁的生日时，侯宝林送来自己的字，黄永玉他们教他怎么吃大闸蟹，怎么欣赏俄罗斯曲，当白桦因为那句“我爱我的祖国，但我的祖国爱我吗”而成为舆论的中心时，他就直接去家里拍他。“觉得很幸运，他们把我当成个小弟弟”，他回忆说，“我也觉得这个职业非常美好的，我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自由，有这些老先生，你的成果又得到人家的欣赏。”他记得北京冬天的气息，房前堆放的大白菜，有时吃完午饭出门，还能看见有骆驼进城。

五

China after Mao 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看方式，就像布列松镜头中的 1940 年代末的中国一样，它将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中国的定格。即使直到 2008 年 2 月，我才第一次翻阅到这本书，但其中的一些形象早已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那几个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借助路灯阅读的高中生，还有三个穿军装、戴墨镜的少年，似乎变成了八十年代气质的某种标志。我相信，很多中国年轻一代摄影师的成长过程，都曾受惠于不到 30 岁的刘香成的视角。这些照片中，有冲突，有隐喻，有疏离感，也有技巧，但其中始终有一种动人的情绪，对于这一点，Tiziano Terzani 的评论再准确不过了：“对刘来说，中国不仅是个值得发现的真相，而且有关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刘香成还在继续长大，他还是那个精干的小个子，头发比别的年轻人白得更早，他从《时代》跳到了美联社。中国继续开放，社会的步伐走走停停、开开合合，他继续捕捉中国的面孔与情绪。

但是，他的身份意识从未减弱，不断的自我证明是他减缓焦虑的方式。他要离开中国，因为“别人会把我在中国的成就打折扣，因为我是中国人”。美联社的分社遍布全球，他有足够的选择。



他先是前往洛杉矶，这是个引人羡慕的职位。他在海滩旁有自己的住房，开一辆敞篷车，随身携带刚刚出现的第一代的移动电话，每天有大把时间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晒太阳。

这种生活悠闲，却也令人厌倦。“我身上有湖南人的较劲的东西”，他后来说，尽管他从不会讲湖南话。他要去印度。

1985 年初的新德里刺激却混乱，甘地夫人刚刚遇刺，这个古老的文明在现代世界里步履艰难。在印度发现，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人们对宗教的虔诚的态度也与物质匮乏密切相关。

在新德里的刘香成还同时要负责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有时，他还要前往阿富汗，一个即将崩溃的苏联正在进行其最后一场战争。为了获得签证，他陪着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克格勃喝了六个月的威士忌。在阿富汗的战场，他被人用人枪指着你的脑袋，看着四处充斥的苏制的坦克、大炮。苏联撤军后，他还目睹了瞠目结舌的内战，那些吸食完毒品的阿富汗战士跟着坦克从山坡上冲下来，兴奋无比的神情。他和另一位摄影师就在距离不过 100 米的一个有篱笆的小房子，不停的拍，沉浸在同样的兴奋里。回来冲照片时，他才觉得后背发凉，“他们手持的那个火箭筒，如果稍微晚两步，我就会被轰掉。”

四年后，他再次准备离开，因为“我证明了我在哪里都能做好工作，不仅是在中国”。他前往了韩国，那正是汉城奥运会期间，也是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愈演愈烈，催泪弹的味道四处弥漫。“我每天的差事就是吃完午饭戴上一个防毒面具，出门转”，他说。后来，他对防毒面具是特别的敏感，而且他的防毒面具的那个玻璃同时是个眼镜，这样近视眼的他可以拍照。

汉城之后，又是莫斯科，这个曾代表人类希望的社会制度正在轰然倒塌。在这里，40 岁的刘香成迎来了他职业生命里的另一个高峰体验。他意外的、作为唯一的在场记者，拍摄到了戈尔巴乔夫告别演说时的照片。他记得走出克里姆林宫时的壮观场景，等在外面的大批记者们看到他突然跑出后，几百个人开始叫喊“fuck you”，他们知道这个人获得了独家新闻。第二天，照片登上了全世界主要报纸的头版。“我知道了，fuck you 就意味着独家新闻”，即使今日，刘香成对那晚的奇特场景记忆犹新。也是在这一年，刘香成和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获得

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他的另一部摄影集《苏联，一个帝国的崩溃》也在这一年出版。

六

刘香成给我最初的印象，除了他的银白头发，还有他的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倨傲。2000 年时，他作为跨国媒体公司的管理者的身份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还是北京社交界的一位名人，在时尚杂志的社交栏的照片中，我有时看见他穿着红色的唐装里，右手端着香槟酒杯，笑意盈盈。在一些记者招待会上，我看到他陪在鲁伯特·默多克或是他的儿子杰智·默多克左右。

那时，我 24 岁，刚刚大学毕业，满脑子美国式新闻业的光荣与梦想。刘香成是我眼中最接近这一传统的中国人，与其说我对他的新闻理念或是个人哲学感兴趣，不如说我对他和那么多金光闪闪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普利策”、“时代”……我试图留给他深刻印象，结果变成了笨拙的自我表现，不过他办公室悬挂的那张 1981 年的天安门广场的路灯下阅读照片。

大概是 2006 年，我第一次前往他家。那天下午，我穿过了故宫的红墙，看到了护城河的水光，崇祯皇帝吊死的那座小山包也仍挺立在那里，这个夹杂在毫无特色的厂房间的四合院，像是一个不断消失的文明散落在各处的残存物。

那个下午，我们坐在院子当中喝茶，那两棵石榴树正在旺盛生长，准备孕育果实。刘香成缓缓的端起茶壶，缓缓的说话，他谈到了俄罗斯的特别光线，它使曝光后的胶片有中特别的效果。我喜欢他流露出的诗意，但似乎仍未找到和他交谈的方式。

他的外表和言谈尽管显得随意，却又是一丝不苟的。看着院子的灰色砖墙，我记起他曾说，四合院讲究的是磨砖对缝，所以这每一块砖都是人工打磨出的，每个工人每天只能磨出八块。我对于细节过分敏感的人，总是心感不安，似乎怕打破他们惊心设计的游戏规则。

而且，他似乎习惯于在自己的逻辑内起承转合，他只讲，我的疑问就像打在顾自旋转的转盘上，要么被忽略要么就被无声息的弹回。

也是在那个下午，他提到自己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计划，他编辑一本 1949—2008 年中国的摄影集。“你觉得他们镜头里是中国吗”，他突然问我，没等我的回答，他继续说，“我觉得

那怎么不是我看到的中国呢。”他指的是英文世界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们都看过的 *The Chinese Century*。

我对此不置可否。我们生活在一个影像过分泛滥的年代，人们用对形式感的推崇，来掩盖思想与内心的苍白。在北京，一个自认有文化的年轻人经常会脱口说出“一张好照片胜过千言”。

我刻意很少去少去翻阅照片，去通过图像来理解世界。不过，他的情绪我再理解不过了。鲁迅 1920 年代香港的演讲中，感慨我们是个“无声的中国”——我们不习惯整理与分析自己。80 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经历一个接一个的震荡，几代人中国人在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激发出热情、丢失掉纯真、体验到爱、无奈、孤独、忧伤、理想与仇恨……但关于这一切，我们的记录、探讨显得稀少与苍白。即使做出的陈述，又带有过多的扭曲。

通过编辑一组图片，刘香成试图寻找自己理解的中国六十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再一次的自我证明——他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某种影像上的标准；同时，这或许也是他继续寻求身份认同的方式，他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国家紧紧相联，这个国家正大踏步却脚步慌乱进入现代世界，在上千年的领先和 150 年的落后所制造的混合经验里，它急于证明自己的再度强大，就像北京奥运会的口号“we are ready”。这也是刘香成将 2008 年作为一个历史节点的原因：“中国人盼望了很长时间，盼望的含义之下，就说我在这个世界的大家庭里面，我也坐在主桌上了。”但你仍可以感受到，即使坐到主桌上，我们的内心仍有多么强烈的要证明的倾向——希望别人看到、承认我们坐在了这里。

七

之后，我们偶尔见面，我一直对他的计划深感兴趣。既然他自认要编辑一本中国摄影师视角中的中国，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记得他四合院的家里，到处充斥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还有一张鸦片床——自 1980 年代初购买以来，它就跟随他在全世界搬来搬去。它们都是中国某种符号，既然他讨厌西方视角通过符号理解中国的浅薄与单调，那么他将提供的是什么？我记得 1996 年时，他雄心勃勃要创办的全球中文杂志名字就叫《中》，而英文则是 *The Chinese*，但它却不幸夭折了。而且，我知道他的挑剔，他不会忽略餐馆里的一道菜、他身上

的风衣的缺陷，他该怎样面对那些中国那么多摄影师拍摄出那么多的照片呢？我记得他曾扔给我一本国内著名摄影师的影集，“你能从里面挑出一张好照片吗”，他再一次没等我回答，“我看一张也没有。”不过，我相信他的耐心，他不是可以等待一个工人以每天磨八块砖的速度去盖一座四合院吗？

我的浓厚兴趣中夹杂的怀疑，在 2007 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慢慢消退了。那天，我们先是在满福楼的吃了涮羊肉，然后在他的房间里一边喝着苏格兰的 Single Molt 一边聊天。他的谈兴浓厚，在路过景山公园西门时，他指着那排平房说，过几个它们就要拆了，可以露出公园的红墙，多美啊。在饭桌上他则激动得说起他的新闻理想：“在美国，当人们想严肃的讨论一个问题时，可以在《纽约时报》上争论，在英国可以是《金融时报》或《经济学人》，中国却没有这样一份让人信赖的报纸或杂志……当外人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主流舆论时，却找不到。”

他也说起去编辑这本书，是一个“孤独的历程”，“我看到那么多西方记者、专家谈中国谈得莫名其妙时，我很急，但是你看到自己国家的人也按这种方式这样说话时，就更急了。”

他还说起比利时的汉学家 Simon Ley 用宋朝的一张画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形容：那张画里的森林是着火了，但是上面有几只鸟飞过，每只鸟拿了一滴水飞到火上面来救火——看起来是那么的徒劳无力。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帮助父亲翻译外电的少年，想起了刘季伯那一代人内心的焦灼与感慨。眼前的刘香成剥离了所有外在的符号身份，变成了有点老派的知识分子。

这或许也是他生活中最放松与自在的时刻，他回忆去见中国领导人的场景，谈论西方人对中国理解的偏差。也是在这个晚上，我趴在他的电脑前，去看他初步选出的 1949—2008 年的中国的照片。这是一次快速的翻阅，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照片似乎正在连接成一致的叙述节奏，我喜欢其中散发出的既亲切又疏离的情绪。

对我而言，观看这些照片，像是一次再度发现中国的历程。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这些历史经验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它们经常像是抽象的名词存在我的生活里。

对于刘香成本人，这更是再度发现的过程，不仅是中国，也是他自己。他面对浩如烟海、价值观迥异的照片做出选择。过去五十年中，中国摄影世界被两种世界观影响着。前三十年是一个意识形态左右的时代，人们观看方式来自于特定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人民日报》在 1974 年进行的对安东尼奥尼的批评再生动不过的表明了这种视角，这位意大利导演被指责为"专门去寻找那些破墙旧壁和早已不用的黑板报"，"不愿拍工厂小学上课的场面，却要拍学生下课'一拥而出'的场面"，"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那个年代投身摄影师的也印证了这种观念，刘香成发现，很多人是退伍军人出身，只要人高高大大的，就可以扛摄影机……

但转瞬之间，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摄影又变成了庞大的消费工业的一部分，人们不停的拍照，是因为它能提供娱乐、刺激购买力……过多的图像不再像是加深记忆，而经常使记忆消失，它们变得像是某种麻醉剂，使人们感受钝化……

刘香成要在这样的迅速变化中，建构出自己的逻辑，寻找自己的情绪。他能依赖的除去专业训练，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感知，其中蕴涵了深厚的同情，这种同情心使得我们昔日和今日的荒诞举止，显得不仅仅是荒诞。

八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不断翻看刘香成编辑的这些照片。从身穿棉军装的解放军进城，到巨大的路易·威登广告下的行人，六十年来，这个国家一路上走来，经历过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变化，却似乎仍旧生机勃勃的前行，这令人赞叹，也有同样多的无奈。

我喜欢刘香成的那个比喻，他说中国像是水面上的鸳鸯，表面非常安静，在水下面它的脚是在拼命划动的。仔细想来，大多数中国人平静的外表下，都隐藏着多少戏剧性的故事。

刘香成兴奋地等待着《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的出版，他乐于谈到他的出版商 Taschen 的传奇经历，并等待今年七月举办的盛大的首发式 Party，他喜欢得到人们的关注，生活在聚光灯下，被人们谈论，这既是他孩子气式的好胜心，也是缓解他一直隐隐的身份焦虑的方式。

这本书的封底照片是一个滑旱冰的青年正单脚滑过毛泽东像，这是他在 1981 年的大连拍摄的。他的第一本书的名字仍有时代意义，过去六十年的中国，不正是因为毛泽东而划分的，

前三十年，人们在他的意志下生活，而后三十年，人们则试图清除这种影响，却发现他仍在强有力的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

（许知远：作家，《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主编。原文链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0478 ）

【返回目录】



10-6 张志安对话吉米：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



“我们以前的问题是，你想写个报道，讲一些问题，你的报道可能被认为是负面的，按理说应该把另一方的立场、声音发出来，但那往往是政府的看法，但政府的声音往往发不出来，因为政府不想说，甚至不给你回电话。所以，过去的问题往往出在这儿。”

CNN 驻北京分社社长吉米（Jaime A Florcruz）访谈。个人简介：吉米（Jaime A FlorCruz）1951 年 4 月 5 日生于菲律宾。在菲律宾上大学期间，他是一位激进的反马科斯政权分子。1971 年 8 月，吉米来到中国进行一个为期三周的旅行，却意外地被困在这异国他乡，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1972 年，马科斯宣布进行军阀统治，一年后，吉米的菲律宾护照过期。此后，他困于中国长达 12 年之久。

在华期间，吉米不仅学习、工作，还周游各方。1972 年，他在湖南省的一个国营农场劳动了将近一年，后来又到山东省的一个渔业公司工作（1972—1973 年）。到北京后，他在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前身）系统地进修了两年中文（普通话），还参加了翻译培训。1982 年，他获得北京大学中国史的学士学位。此前，他曾于 1971 年在菲律宾理工大学获得广告学学士学位。

吉米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论文研究了中国 1935 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写论文期间，他还担任了美国《新闻周刊》的新闻助理（1980—1981 年）。1978 年，吉米每周给北京大学的老师进行两次英文培训，后来又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培训英文（1979—1981 年）。他还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一个名为《大家一起唱》的栏目里教英文歌曲，并且有过几次上镜的经历。

1982 年，吉米加盟了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中国记者站，并在 1990—2000 年期间担任其首席记者。2000—2001 年，他在纽约获得了艾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新闻基金

会的研究基金，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新闻研究员。吉米于 2001 年 7 月加盟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目前担任 CNN 北京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在 1988—1990 年，以及 1996—1999 年期间，他曾两次担任“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大概有 200 多位成员。

吉米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菲律宾语以及中文（普通话）。

访谈时间：2008 年 1 月 30 日上午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当记者，又简单又困难

问：您在中国生活了 30 多年了，又是亚洲人的面孔，把您看成外国记者，我们都觉得有点别扭。您自己也会有跟其他外国同行不一样的心理感受和身份认同么？如果有，这种不同主要是什么？

答：我想主要是有对比的好处和机会。我最早从 1982 年开始在《时代》周刊工作，那时候，当记者是又简单又困难。简单是因为可做的东西很有限，中国当时的体制、政策对外国记者限制很大，采访的机会特别少，能做的报道也少。主要是因为社会本身，体制的控制是很严格的，很难交朋友，官员和老百姓都很避讳我们外国记者，住、行也都有限制，我们住在什么地方都是指定的，出去行动和采访也很有限，一般都得有指定的工作人员陪着我们去。要去外地采访得特殊申请，批准了，才能去，而且一般都是集体出去、集体采访。所以，那个时候能够到比较新的地方、新的城市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

问：能出北京都这么不容易？

答：对，包括几年以后，大概 1988 或 1989 年，组织我们去西藏，那个时候已经是不得了的事了。说简单，也是因为当时外国记者团特少，十几个媒体，可能还不到 100 个记者。一方面，我们都很团结，谁都认识谁，而且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另一方面，我们又都觉得困在一个地方，信息很少。那时候，除了官方的消息来源以外，很少能得到非正式的或者通过私人关系获取所谓的“小道消息”，能够抢到一些新闻也是很大的事。

问：80 年代，你们外国记者基本上都在规定范围内有限地做报道。当时，对中国的报道恐怕不是非常负面吧？

答：不是。它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那时候，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不都是特别负面的，甚至是浪漫化的 把中国浪漫化。尤其 80 年代初，很多记者都是第一次来中国，虽然学过中文或中国学，但对中国不够了解，最早的一些报道写的是新鲜或浪漫的中国故事。后来开始有一些负面报道，因为很多人开始敢跟外国记者接触，传递一些信息，发表一些意见，才开始有那种负面报道的叙事吧。

那个时候，最早的报道主题、文章是关于北京烤鸭或者中国熊猫的，还有中国没有广告、没有送比萨的，等等，都是很好奇、很稀奇的东西。另外，很多报道都是有关政治的，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活动或者政治斗争、权力之争，这类文章中分析报道比较多。有个说法叫“tea leaf reading”（茶叶占卦），就好像看茶叶来推测一些事情，“reading tea leaf”的意思就是通过看茶叶能得到什么提示，判断会有什么结果。把它比喻成这样，是因为关于中国的政局，我们能知道的或能琢磨透的很少，只能猜测、推测。有一些所谓分析家，就凭着谁跟毛主席或当时的领导人坐得近来推测谁的官职会上升，从 70 年中后期一直到 80 年代初，都是这样。

问：80 年代，兴起全民文化热，西方哲学等思想涌进中国，个体意识解放、社会观念逐渐多元化，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报道的主题是不是也逐渐多元化？

答：我想是多元化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了一定深度，针对一些具体话题，我们开始有比较深度的接触。

问：采访限制上，会不会也有所变化？

答：逐步有一些变化，不过还是很初步。我记得，1988 年的时候，那段时间还算是比较开放的，主张透明度，在媒体上也有所反应。当时很活跃，包括媒体也很活跃。

问：1987 年是所谓的“深度报道年”，《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做了很多改革人物的报道，发表了很多深度报道。

答：很多长篇报道。外国媒体也同样受到了一些启发，接触到比较广的信息，从主题来讲，从深度来讲，当时的气氛还比较宽松。

问：当时，您在什么媒体工作？

答：还在《时代》周刊工作。有一次，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搞活动，我也参加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高级领导人比较自在轻松的样子。会场的气氛也比较轻松，做外国记者工作的人好像也比较主动地给我们介绍情况。当时的中国记者协会也比较活跃，有一帮比较年轻的人，比较开放，组织了一些发布会和参观活动。

大概 25 年以前，外交部第一次开始搞发布会，钱其琛是新闻司的司长。当时，大概每个月一次或两星期一次，很简单，也就是在国际俱乐部这个地方，上面有个小电影厅，我们几十个外国记者就在那儿听。一般他们就念念稿子，20 分钟左右，最早的情况是发布完就结束，不回答问题。

2000 年，我离开过中国一年，在那之前，可以做的东西也多了，可报道的题目也多了，我们当时关心的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中国的媒体也更活跃、更多元了，消息来源比较多。不过，关于正面、负面的比例很难分清，应该算比较平衡吧。

可以批评你，但也给你说话的机会

问：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1996 年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李希光、刘康著）一书，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您对此也有所关注吧？

答：我当然知道这本书，也关注到这种言论比较多。我觉得是个理念问题，能不能判断外国记者有意识地找中国的茬，还是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和现象？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小型论坛，大家都觉得，我们外国记者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公关公司，没有义务替某个国家辩论，但这个不等于“妖魔化”中国。说一些负面的意见，写一些不好听的文章，也不等于“妖魔化”。我们没有义务关心或者考虑两国关系是否会因为我们的文章而受到影响。

问：那个时候，这种讨论有结果么？

答：我觉得没有很明确的结果，但现在，这种“妖魔化”的理念已经被逐步改变，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在慢慢接受我们的想法。

问：你们的讨论还是小范围内的，普通老百姓恐怕很难知道。您觉得，近年来，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何变化？

答：虽然也还有些限制，但近几年形式上的变化比较明显。发布会肯定比过去密集多了，老百姓也比较愿意接受采访了，交朋友比较容易了，建立信任以后也很愿意讲。报道的主题、内容也多元化了，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出去采访了，不一定限于北京或上海，很多记者到全国各地去捕捉新闻，把各地一些故事讲出来。

问：嗯，报道的密度更加集中、题材更加多元，关注政治之外也非常关注经济、环保、农村等。但是，好像有两点没有根本性改变：一是依然以报道发展中呈现的矛盾、问题、缺陷为主，二是依然将很多议题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挂钩。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受？

答：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是正常的，没什么新鲜的，新闻强调反常，下意识地会反映出这种形象。我觉得，关键在于报道本身是不是平衡和公正，是不是能讲出负面和正面的东西，在一篇文章中能不能反映出两方面的看法和声音，我没做过很系统的分析。

作为一个记者，这种精神、理念是总的目标。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是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可能有些报道负面的东西比较多，或者专门找一些中国的问题来报道，但他们在别的国家也都这样做。

问：从单篇报道来讲，能够做到客观和准确，但从整体来看，这些报道会让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形成偏见或某种刻板印象，很难建立真正全面、完整的图景。如果希望外国记者在“微观真实”基础上去做到“宏观真实”，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答：太高了。我们以前的问题是，你想写个报道，讲一些问题，你的报道可能被认为是负面的，按理说应该把另一方的立场、声音发出来，但那往往是政府的看法，但政府的声音往往发不出来，因为政府不想说，甚至不给你回电话。所以，过去的问题往往出在这儿。我们也给中方官员说过这些，这些年，一直跟他们说，建议他们最好主动地发出声音。情况已经有所改

变，他们已经开始做了。他们也意识到，“我们不能等”。你不能告诉我“明天答复你”，新闻要快。你今天不答复我，那你就放弃了，你就算弃权了。比如，关于布托被刺杀，（2007年 12 月 27 日下午，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在该国东北部城市拉瓦尔品第参加集会遭自杀式炸弹袭击死亡，终年 54 岁）我想让中方（比如新闻司）给些反馈，这个不算负面吧，给他们打电话，他们答应给我们 15 分钟的专访时间，单独过去就开始拍。可见，他们已经开始掌握这个道理，更及时、更快地发布消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批评你，但我们也愿意给你说话的机会。

问：您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可能很复杂，这个跟您的个人经历或许有关系。不知道，您对这个国家的看法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答：30 多年来，的确有很多变化。

问：当时作为青年代表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带着很多浪漫的憧憬？

答：是的。我也会看到中国很多的问题，但我能欣赏很多的小变化。一些小变化、小提高，在外国人眼里算不了什么大事，尤其在他们国家是小事，但对我来讲，知道以前是怎么样的，就能欣赏近几年的小小变化。而且，我知道来得不容易，也还可能会倒回去。所以，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我是深有体会的。

问：有很多外国记者来华驻站一两年就回国了，或者轮值三四年就走了，他们的确很容易拿自己国家作为参照，以此来反观中国，会觉得很多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里变成了不可思议，违背了某些常识，自然会有质疑和批判的倾向。而您这么多年在中国生活，自然会有一种本土的、历史的比较意识。

答：看怎么衡量，这是 glass，halffull（一个杯子，一半满）。我觉得，一半是满了，因为我看过它曾经空空的样子，但很多外国记者看，还空了一半。

问：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您对中国感情有什么变化呢？



答：从感情上，看到中国熬过来很不容易，我还是很乐观的。而且，我觉得，在中国没有不可能的事，不能说“never”（从不）。70 年代的时候，如果有人能预言到中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是不可能的。中国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作为一个观察家，我能想象的中国是有限的，从趋势来看，虽然有很多问题，但还是比较积极的。

我们要所谓的“容忍不完美”

问：据您观察，跟（20 世纪）80 年代相比，外国记者的中文水平是进步还是退步了？

答：具体到一些人，还是有进步。但因为人比以前多了，不一定有大的改善。特别是最近马上要开奥运会，派过来的记者非常多，这些人未必是经过训练和学习的中国通。有一部分人学过中国学，但又刚毕业，没有经验；有的是资深记者，但没有做过中国报道。

问：其实，相对报道框架而言，语言不是主要问题。就我观察，西方记者对很多具体问题的报道能遵从客观报道的基本范式，但报道中体现的对事实的理解，往往以自己熟悉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作为参照来进行判断。昨天，我们采访《联合早报》的记者，他也感觉，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文化差异非常明显。

答：我在菲律宾长大，也经常回菲律宾。我的经历和以前的感受，对我看中国是很有用的。我的对照体系和其他外国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很不一样。我看社会变革的水准，和他们也不一样。因为很多东西，中国和菲律宾对比很不一样，中国和美国、西欧国家对比也不一样。一样的事情，在报道中会有不一样的体现，所以，我们要所谓的“容忍不完美”。

问：可惜，像您这样能够“容忍不完美”的外国记者是少数。

答：恐怕是。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每个人出生的地方，社会准则、观念标准都不一样。

问：如果我是您，也许有时候会有一种困惑：我是亚洲人、东方人，有我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和地理意识，但我却服务于欧美国家的主流媒体，必须遵从他们的价值观念？



答：对。这是一种困惑，或者是一种矛盾。但是说到底，还是存在着一种普适于全世界新闻业的原则，不管我们的国家、种族、性别、宗教如何，我相信总有些东西是我们所共同追寻和共同遵守的。

问：这两天，您也在组织报道南方冰雪天气带来的灾害。我们与一个英国记者交流，她很生气，说："你看这么多老百姓都滞留在广州，没办法回家过年，你们的总理还在接待外宾。"对这次灾害，您会怎么做报道？

答：我看过那样的场面，中国也处理过类似的危机，只不过今年比较特殊一点，因为两个因素：每年都有春运，都有特别挤的场面，每年也会遇到暴风雪，只不过今年两个正好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在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够有效处理这样的危机，如果在别的国家，已经开始闹事了，可能社会也不稳定了，群众开始发泄、砸东西或烧东西了。所以，我觉得没那么坏，局面还在控制之中。一个国家领导人见外国领导人，不一定因为这个就不见了。

问：是啊，昨天温家宝总理去了湖南，在长沙火车站抚慰滞留的乘客。

答：今天的报道，我们就突出总理向人民道歉，这个属于比较少见的做法。

问：我想，您恐怕能够理解老百姓面对危机时的容忍，也能够肯定政府解决问题的姿态和措施，这跟您多年的观察和体验是密切相关的。但如果新来的记者不了解历史、不熟悉中国，就容易下简单结论：老百姓如此愚昧，政府还在作秀。

答：对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对比，对普通老百姓的理念、思想也缺乏深入了解，而且，中国政府的体制还是有能力从上到下进行动员的，能够依靠党、政、军等各种力量来解决危机。

问：如果没有真实的判断，何来真实的新闻？有时候，我甚至会想，一个印度来的记者，看到中国的春运，再联想到自己国家老百姓挤火车的情形，也会多些体恤。

答：没错。而且从人数、从场面上来讲，这个在世界上很难看到，几十万人、百万人，在那边待着，等着发车，等着回家，这是想象不出来，如果在别的国家已经骚乱了。

问：他们恐怕也难理解中国老百姓渴望回家、团圆的情感，为了合家欢聚，忍辱负重也值得。

答：肯定很多人也都烦，但可能在西方记者眼里，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还能容忍，为什么不反抗。这个也是文化的隔阂。某些是体制原因，某些是表面现象。

中国是幅马赛克，只能片片贴出来

问：西方记者报道中国，不可避免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族利益、个人经历等因素投射其中，整体上要求西方媒体全面均衡地报道中国，好像是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答：（笑）有可能。最近，我觉得中国可做的就是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方便给外国媒体，然后让我们多听听他们的声音，不光是政府的声音，还有中国人的声音，把这些声音能够写进去、放进去，已经算是很成功了。

问：是啊，如果不及时发出声音，给记者提供不同的消息源，等误解加深、谣言扩散的时候再补救为时已晚。

答：甚至我们已经不做这个报道，换到下个题材了。

问：对政府和官员来说，您的建议是行之有效、可以实践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改变西方记者的看法，让他们也能像您这样换位思考、历史比较，恐怕太奢望了。

答：不容易，因为这也是客观的限制、客观的情况，由 DNA 定下来的，社会准则、文化背景、学术熏陶，这些都是不容易改变的。

问：这几年，CNN、BBC、《时代》都对中国做了专题报道，对改善中国形象、扩大中国影响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整体上还是以负面问题为主，对政治改革、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也普遍存在。所以，要让老百姓把“妖魔化”认知从内心深处驱除，恐怕还很难。

答：我想也是，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标准、目标或要求适当放低一点？我想，很多国家也没有 free lunch（免费的午餐），从媒体来讲，没有一个国家或社会可以免费享受比较完美、好看的报道，可能这个比较现实。何况作为报道对象，中国对外界来说，很难理解，又大又复杂，历史又那么悠久。在北京看和在青海看不一定是一样的，很难判断出真理。一个基本的道理，很多人都是在盲人摸象，各有各的表述。我们报道中国，也有一点像这样的现象。

我在讲演的时候，把中国比喻成一幅画，一块一块拼出来的 mosaic（马赛克）。中国是一幅马赛克，我们只能一片片地把它贴出来。我希望，我们的观众读者能一块块地理解、吸收，可能过一段时间，从比较远的角度来看它，才能看到轮廓本质是这样的。如果咱们看得很具体，一个一个报道看的话，可能就是一片黑，或者有的是灰色的，有的是白的、红的。

问：可能现在是灰的比较多，红的比较少。

答：我觉得，只能是这样的，和中国的变化也有关系，是不是客观反映也不一定。比较现实的目标就是，在我们的报道里面，把它看成是一片一片积累起来的一幅画。如果我们能够塞进几个颜色的话，就会好一点了，可以给我们的外国读者提供比较完美、准确，可能还不是全部的概念，但这也很难。

问：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既靠记者的专业素质和积极作为，也靠读者的全面接触和理性解读。当前，如果要切实改善中国形象、推进外国媒体的全面报道，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政府及时、主动发出声音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答：把中国的门打开，全部打开，让更多的人亲自来看看中国、经历中国吧。作为旅游者，如果能亲自到中国看看，和中国人接触下，如果我们报道不准的话，他们能看得出来，会对比、会反映出来。包括一些编辑，我们是叫 gatekeeper（把关人），他们有时候定调子，指定某些文章或题目，如果也能经常来一下中国，感觉会不一样。我自己也有过经验，没来之前和来了之后，对中国报道的调子、理念、印象会有一些改变。《时代》一样，CNN 也一样。一是他们对中国的兴趣会更浓；二是他们会让你做更多、更广的题目，不像以前关心政治的偏多。如果他们能亲自来，认识中国人，会有一些改变。

问：那么，中国媒体又能做些什么？



答：中国媒体也要遵守公正、平衡的报道原则。如果只做一边倒的报道，或者太好，或者太坏，对中国不利，国际形象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中国媒体能提供比较完美、公正、平衡的报道，也会帮助外国媒体得到启发，或者能够反映在我们的报道里面。

问：比如《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或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这些深度报道媒体的存在正发挥着积极的优化作用。

答：我觉得是。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媒体的多元化，能通过他们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角度，这样能平衡对中国的看法，能够反映在我们的报道里面，对中国也有利。

最好是踏踏实实地报道，最好是黑色、白色都能反映进去。这样，我们的观众、听众、读者对中国会多些理解，一些要求达不到心里也比较平衡，一些很负面的东西也不会太惊讶，如果中国继续往好的方向变化也不会觉得很离奇。我觉得，这样才好，如果我们外国媒体把中国美化或妖魔化，都对中国不利，对外界也不利。美化反而把目标定得太高了，达不到的；妖魔化，别人到中国以后也不会信你。

问：我曾经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境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既不是“妖魔化”也不是您讲的 80 年代的“浪漫化”，是不是“框架化”“多元化”之类的？英国《卫报》记者说，他觉得是“提供异见”。您觉得，什么词比较准确？

答：多元化（diversification）。外国媒体的类型多元化了，不像以前能派记者到中国来的，大部分都是西方媒体。近几年，有些国家开始派驻京记者，这也是很好的，能够平衡、多元化。欧洲、北欧，个别亚洲国家也开始派记者，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这是好事，这样的话，外国记者的声音也多元化了，或者观察中国的眼睛也多了。从题目来讲，比以前也广泛了，虽然现在还是有点 evergreen（常绿），即一年中可以写得同样的几个题目，但是不像以前那样限制，也有所放宽了。

另外，中国的声音也多了。中国应该鼓励一些非政府组织，多跟媒体打交道，包括学者、记者、观察家，他们的声音可能比官方的声音更有说服力。如果我们外国媒体能够多接触这些人，他们可以把同样的东西说得更有说服力，他们的身份也能让记者放弃对宣传的反感。最近几年，开始有一些这样的人了，以前可能怕遇到麻烦不敢说。他们的观点比较容易用在报道



中，最起码把中国多元的声音反映出来。我们以前主要做硬新闻的报道，现在喜欢讲故事，常用的做法是：捕捉一个具体的人、事，然后慢慢放大。

问：从具体场景、人切入，然后引出问题，进行分析，展现方方面面，最后意犹未尽的结尾，这种华尔街日报式的体例。

答：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做了，培训各层次的官员尤其是媒体官员，邀请我去给他们讲，就很好。我主要是要告诉他们，外国媒体怎么做新闻，为什么这样做，希望他们能理解我们的需求，能提供一些方便。对他们来讲，很多问题出在不理解，他们想做的是宣传。我讲，要避免 P 这个字，就是 propaganda（宣传），我们不需要宣传，也不接受宣传，你就提供方便，我们自己接触，可以如实反映。我们也劝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不要太高，能够得到 70％的正面评价就不错了，不要指望 100％。

问：我听过一位学者搞新闻发言人的培训讲座，竟然教官员们怎样控制、忽悠记者。

答：我也告诉他们，你们做的一些宣传安排，一看就能看出来，你做得再好，我们一下子就能闻到 P。我希望他们能接受这样的意见。如果这样的交流多一些，会好一些。

我也相信，有些人理解不了，这种问题国外也有，所谓 spin the news（编造新闻），把新闻引导到想要去的方向。

问：如果我们这本书能出版，既希望这些官员能够读到，也希望让外国记者看到，相信您的很多看法以及其他同行的思考、我们的总结，对大家会有启发。

答：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中国读者对外国媒体的认识、要求和期待比较现实一点。

问：就像您说的，要“容忍不完美”，不要过于苛责，不要简单地下“妖魔化”的结论。

答：嗯。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助理。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4/张志安对话吉米/ ）

【返回目录】



10-7 杨潇：金玉米在北京没有“单位”



“‘他的人缘特别好，到处蹭一蹭，能成功地蹭出很多东西，’曾经在外媒工作过的刘欣说，‘而且，他绝对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外国人，一般外国人的思想都比较体系化，也比较黑白分明，但金玉米会说，你不一定同意这个体制，但是你得去了解它. . . .’”

作为一个老外，他似乎永远能理解那些形迹可疑的中文词汇，并且，把它们花样翻新地用出来

“你来中国 15 年，觉得自己融入主流社会了吗？”

刚一张口就意识到这是个蠢问题——首先，到底什么才是“主流”呢？CBD 国贸？还是一些日报？坐在我面前的南非人金玉米（Jeremy Goldcorn）立即联想到自己不久前参加的奥巴马访华博客吹风会，然后吃吃地笑。在那个由美国驻华使馆组织的吹风会上，中国传媒大学的王铮老师说：“刚才这位博客问的问题根本不代表中国主流，大多数中国人不关心言论自由，只关心是否能自由做生意和进出美国自由……”

中国文化毕竟博大精深，多数老外，能说几个歇后语，就要被啧啧称赞，金玉米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似乎永远能理解那些形迹可疑的中文词汇，并且，把它们花样翻新地用出来。他在新浪微博的自我介绍是：“南非人在北京，偷着乐。跟李宇春没任何关系。”迪士尼确定落户上海那天，他发了条链接，前面写着：“外国低俗文化传播公司要在上海建立主题公园。”说起来，为了反“低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网站“单位”（www.danwei.org）都在首页最上端扯着一副红色横幅：文明办网。但是，7 月 3 日起，网站还是意外地一枝红杏出墙去——中国大陆地区的网民发现，它无法登陆了。国庆节后，金玉米终于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困惑，“也没有热线可供我们询问——同志，为什么我的网站被挡在外面了？”

冒牌老外

“单位”在 2002 年 10 月 24 日上线，那一天正好是宋美龄逝世，金玉米翻译介绍了搜狐的纪念专题，并链接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单位”出名则是在一年以后。某一天，金玉米在一本时尚杂志看到对木子美的采访，他很快找到了木子美博客，并试着把它翻译成英文，接着又跑去采访了她。“一下子单位被很多人关注，马上就有外国记者 email 过来要求介绍认识木子美……”

那时候关于中国的民间英文站点还很有限，没有 CDT（chinadigitaltimes.net），东南西北（www.zonaeuropa.com）也刚刚创立，“这种信息来源很少，我们把什么翻译过去，立刻就有外媒会反应。”

那时候金玉米也刚和女朋友分手，多少有点郁闷，白天还要在广告公司面对客户。于是，对单位的不满就发泄在“单位”上，每天晚上，一个人呆在家里上网“看东西翻东西”，然后就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都译成英文发上去。几年前，除了抗议炸馆那会儿，他看不到中国的民意在哪里，“最多和朋友聊天知道一些”，但是这时候，网络好像“突然打开了看见中国的一个窗户”。

“单位”的日点击量稳步增加，从几百到几千，然后上万，有一阵子，他整天拿着 DV，戴着一顶黄色的安全帽在北京窜来窜去，采访三教九流，然后制成 Danwei TV 放到网上。金玉米觉得，和“单位”一样，“安全帽”也充满了中国意味——既表示这是一个在快速建设的国家，也暗示你总需要一些东西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除了每周一到周五固定介绍一两份报纸的头版，“单位”并无固定栏目。现在，它除了金玉米还有 3 个成员，都是因为热爱这个网站前来投奔的，刘欣是其中之一，她每天要浏览 700—800 篇文章——多数来自她订阅的中文博客，也有一些是中文媒体，然后选择自己觉得有意思的译成英文。至于有意思的标准，金玉米说，“有时候是你没想到在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是你完全知道它要发生，但是还是很有趣，比如国庆节那天，我们会把很多报纸的头版都拼在一起做一个大图，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些报纸长成一个样子。”



但他们也会翻译对田壮壮的长篇专访，“这类东西可能点击率不高，但几个月以后，可能就会有国外某个大学的教授给你写信：你好，我正在做关于××的研究，看到了你们的文章，希望……”

有一次，这个“冒牌老外”在后海采访名博王小峰，上来就不怀好意地笑：“咱们今天别谈文化，谈谈脏话吧，前一段你写了篇文章讨论‘傻×’，你写脏话的东西我就爱翻译……”

“单位”这样“重口味”，自然不适合初学者，“我们的读者当然是外国人为主，但也不是给那些对中国完全没有了解的外国人看，你对中国一点都不知道，那你先到别的地方去学习一下去……”

胳膊拧不过大腿

1994 年，给曼德拉投完一票后，金玉米离开了南非，在英国呆了一年便来到中国。他不懂中文，也完全不了解中国，以为中国人都很拘谨严肃，“和日本人一样呢。”

最早接触媒体这一行是 1997 年，做一个独立的英文杂志，“那是一个‘非法出版物’，很麻烦，被查封过一次。”后来就一直做杂志和网站，但是每个地方都呆不长，基本上属于没有单位的人，“很像北漂的感觉”。

中国的城市里，金玉米最喜欢北京、昆明和成都，“昆明人和成都人生活节奏慢，喜欢聊天，北京也有点这个感觉。”他喜欢去上海出差，但不喜欢住在上海，觉得上海有点像有人形容的美国，“Business is business”（公事公办），可是北京呢，“唉，乱七八糟，搞政治的，搞文化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目标。”

北京是个圈子构成的城市，每一分钟都有新的“局”在召集，每一秒钟都有人在聚众空谈——据说这是一座适宜扯淡的城市。金玉米热爱交谈，朋友之间的“胡说八道”更令他享受，在发现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么严肃拘谨后，他就凭借天生的亲和力和幽默感，一头扎进了聚众扯淡的汪洋大海，“现在不太泡饭局啦，老啦！”38 岁的金玉米嚷着：“可是 5 年前，10 年前，我就是经常泡饭局，参加各种活动的。”

“他的人缘特别好，到处蹭一蹭，能成功地蹭出很多东西，”曾经在外媒工作过的刘欣说，“而且，他绝对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外国人，一般外国人的思想都比较体系化，也比较

黑白分明，但金玉米会说，你不一定同意这个体制，但是你得去了解它，它也需要一个过渡。” 金玉米自己则说：“我知道在中国怎么做事，我了解这里的人际关系超过了解南非。”

不过，中国也会时不时提醒一下金玉米，他仍是个外国人。今年年初，金玉米成立了北京丹位咨询有限公司，试着运用自己广泛的人脉，为一些国外公司提供互联网方面的咨询，这等于正式放弃了把“单位”做成媒体，进而靠刊载广告盈利的企图。在中国，完成从个人博客到商业网站的跨越，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对外国人就尤其如此。

但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7 月 3 日起，“单位”在国内无法正常访问，这竟让金玉米多少感到一丝庆幸——幸好调整了方向，不然岂不是一出更大的悲剧？“这件事情提醒我，在国内暂时还没办法运作一个独立媒体，这一点其实我以前知道，但之前一直抱有幻想，觉得也许能找一个办法来做呢。现在百分之百明白看清了，胳膊拧不过大腿。”

anti-cnn 也有他们的道理

一些媒体乐于把金玉米比作“桥梁”，他也确实参加过一些中非交流的活动，但他显然不仅仅是“中×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这已是上个世纪的修辞了。如果你把新媒体的崛起和民智渐开视作两个日渐关联的事件，那么金玉米就是这若干推动者、知道分子、意见领袖中的一个，甚至，他们面临的表达困境也是相似的。

在博客吹风会上，金玉米听到饶谨向美方提问：“我从《越狱》和《变形金刚》知道，FBI 和美国军方很容易侵犯人权，我也用 gmail，请问美方如何确保我的隐私不受侵犯？”

从去年 3 月西藏事件起，金玉米就一直在关注饶谨和他“戳穿西方媒体造假丑行”的反 CNN 网站（www.anti-cnn.com）。“我觉得这个是我面对的最难说清楚的事情。”他说。

他的一些中国朋友觉得这网站很傻，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他们 anti-cnn 也有他们的道理，西方媒体不一定是故意的，但他们报道中国的方式，是导致很多西方人对中国有偏见的原因。比如，他们会以为中国人特别不自由，到处都是单位在干涉，干涉你的户口，干涉你的结婚生子什么的，但其实中国人有很多自由。西方媒体确实也会犯错，比如西藏报道错用尼泊尔的照片，这都是很可笑的，也确实该由中国人提出来。可是呢，我又觉得你不能因为 CNN 不

好，就不说 CCTV 的事情了，而且，可能确实有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外国人在说中国人的坏话，可是中国的坏事也确实在发生，难道就不应该说吗？”

批评不自由，不单赞美无意义，而且反向批评也显得可疑，这就是金玉米觉得在现阶段，讨论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会“特别复杂”的原因。“有人怀疑，饶谨是不是 5 毛党？我觉得他不是，是独立自发的，但是他说的这些东西如何才能让人觉得是独立自发的？所以体制总是在不停地制造矛盾和不信任。”

今年 7 月，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热比娅的纪录片，后来电影节网站遭到中国黑客攻击，攻击者还留下了名字。一些西方媒体说这是政府指使，但金玉米找到了这位黑客，在线采访了他，“我觉得他也是自发的。”后来他据此写了篇文章，告诫西方人：很多中国青年不单爱国，也爱党，你轻视这个，就不会理解中国。

结果他也被人骂了，“他们说我讨好中国政府，是为了让我的网站解封……”

回到约堡，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

北京在夏天的时候，午后常有对流云团带来隆隆阵雨，有时白昼若夜，但很快就会露出碧蓝的天空。这会让金玉米想起自己的家乡约翰内斯堡。

不过，在过去 15 年里，他只是偶尔回南非短暂地居住，最长的一次也只呆了 4 个月，“我回到约堡，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南非已经不是他当初离开时那个南非了，种族隔离没有了，那个伴随他从小长大的政府没有了，更重要的是，和无数北漂客一样，他已经被北京改变得太多，家乡回不去了。

有时候，他的大学同学会突然给他发一个链接，里面是某个外国报纸对中国的一篇报道，“我就会觉得，这真是傻×啊，他们对中国，对我的生活、我每天做的事情没有概念，看不懂听不懂，哪怕他们来了北京，和我住了两个星期，也还是不明白，还是会说，你到底在干吗呢？”

现在，咨询工作已经解决了“单位”4 位员工的工资问题，“单位”网站也将作为他们展示自己的门户继续在墙外发展壮大。7 月 3 日以后，它的流量一下子下降了 20%—30%，但半年以来又慢慢地升了回来——只要你想看，总是能够看到。而随着时间的增长，金玉米又开始

意识到它的另一层价值，“有时我在想，2004 年夏天北京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去找当时的文章和视频来看，有点像做纪录片似的。”没错，在这个人人时代，大家都知道你夏天干了什么。

（杨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38188 ）

【返回目录】



【史】

10-8 魏一帆：新埃德加•斯诺是否“互信赤字”的良药？——出世 40 周年的遗产矛盾

“斯诺在苏区获得的采访自由度，今天的记者做梦都会羡慕。周恩来亲自为他安排了 92 天的行程，最后延长到 4 个月。老战士给他讲长征的故事，农民坦率地跟他谈对共产党的看法，晚上他常跟政治局委员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打牌。当然，他也多次跟毛泽东聊到深夜。”

在给美国大使纳尔逊・詹森的一封信里，针对自己关于红色中国的新闻报道在国外被指为“偏袒”，埃德加・斯诺写道：“我相信作为美国记者我有权说出我所见的实情——正如中国记者在美国也有同样的权利。”

这并不是抗议美国批评他的作品。多年以后在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时局下，他才受到美国的猛烈抨击。这是 1937 年，斯诺刚从中国的红色根据地回来，过去那是媒体禁区。他成了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国民党政府向美国驻华大使投诉，指责斯诺写“虚假宣传”和“假新闻”。

他这趟 4 个月的旅行被称为“世纪独家”，也为《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这本书打下基础。中国和全世界头一次知道了长征及其革命领导人。据美国一项调查，论 20 世纪初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这本书的作用仅次于赛珍珠的《大地》。斯诺本人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0 年，毛泽东邀请斯诺参观国庆阅兵，轰动一时，这向中国人民暗示对美国改变姿态，同时也向美国传递出愿意恢复对话的微妙迹象。但华盛顿没能领会这个外交信号。亨利・基辛格后来说：“信号太隐晦，我们这些粗枝大叶的西方脑袋完全不得要领。”

当时斯诺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同在阅兵现场，但她也没领会到中方的暗示。一条标语令她困惑：“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显然，妨碍美国人理解中国意图的不仅仅是“粗枝大叶的西方脑袋”。1972 年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是弥合双方鸿沟重要的第一步。而现在国家副总理习近平访美，仍将讨论两国间的“互信赤字”。



1972 年 2 月 15 日，在美国总统出发访华的 3 天前，埃德加·斯诺在他瑞士的家中去世，享年 67 岁。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尼克松等人都致信吊唁这位美国记者，足以证明他的新闻影响和政治影响。

但在斯诺去世 40 年后，他的名誉仍然受损于“宣传”和“偏袒”的指责。外国驻华记者倾向于把斯诺看作中国共产党的工具，不愿意别人把他跟自己往一块儿联系。而很多中国人认为他是公平的旁观者，他们想为什么今天不能培养更多的斯诺，让世界更理解中国？斯诺身后声名的矛盾，从他 1928 年旅行到更加矛盾的中国时就埋下了伏笔。

在自家客厅点燃叛乱

埃德加·斯诺原本计划在中国停留 6 个星期，最后变成了 13 年。

22 岁的斯诺正在走四方，他到了上海。当时驻华外国记者的圈子不大，而上海是这个圈子的中心。斯诺很快跟圈子里的美国记者熟识了，他们大多数人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斯诺也在那儿的新闻学院读过一年书。当时上海的主要英商称这帮人是“牛仔记者”，因为他们“根本管不住。”

来之前斯诺对亚洲一无所知，但随后几年，作为自由作者，他坐火车几乎游遍整个中国，从云南徒步到了缅甸，又逛到印度，在那里他采访了尼赫鲁和其他政要。他也采访过蒋介石和梅兰芳。他很想继续闯天下，但正逢美国大萧条，工作机会枯竭，他不情愿地留在了中国，后来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

中国当年的乱局使驻华记者圈子内也开始辩论，日本殖民对中国是利还是弊。游历台湾之后，连斯诺也说，日本的统治“当然优于三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统治。”

但从被殖民者的角度看殖民地以后，斯诺坚定地反对殖民。事实上他的观点与家长式、种族主义的西方思维越离越远。中国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斗争开始成为斯诺个人的份内之事。

中国的内部纷争也令他揪心。他遇到过各种人间惨剧：儿童奴工、被迫为娼、疾病肆虐、无处不在的鸦片成瘾、战争、污秽、赤贫。但最悲惨的可能要数 1929 年大饥荒当中饿殍遍野和卖人肉的画面。这几年来他愤怒于中国的弄权者以食物为剥削压迫的武器，愤怒于冷漠的外国人只知指责中国人无情却拒绝承认他们所处的凄惨世道。1935 年日本占领东三省，他说终

于明白了为什么以前很多外国记者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你不能眼看着你爱的女士被奸污而无所作为。而北京真的是很好的老夫人。"

在他的自传中，斯诺说那一年他跟妻子一起，在自家客厅里"点燃了叛乱"。他在燕京大学讲新闻课，常常邀请大学生到他家里聚会，他们谈论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消极抵抗，忧心如焚。斯诺写道，妻子海伦提出了示威的主意，他们俩都鼓励学生领袖并从旁出谋划策。他们也帮助翻译新闻材料，保证外文媒体到现场报道。

计划成功了。示威引发全国的抗议浪潮，国际媒体的报道为北平引来世界关注，促使蒋介石采取行动。斯诺说，这些学生在必要时甚至敢于直面士兵的枪口，从他们身上，外界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勇气："外国记者和摄影师蜂拥而至，希望外国人的见证能够阻止悲剧发生。我们做到了。"

这次事件被称为"一二·九运动"，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斯诺后来淡化了他和妻子"发起"学生运动的作用，坚持声称运动是自发的，既非"亲国民党"也非"亲共产党"而是"亲中国"。即便当时有学生领袖已是共产党员，他们也并没向他透露。

斯诺说，几个月后他在陕西保安同毛泽东谈到了"一二·九运动"。"在我看来他显然知道得很少。但同样明显的是，他无法相信只不过受了些基督教培训的爱国青年发起了这次运动，而且（竟然！）是在燕京这么一所'美帝'经营的大学。"

"现在，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

斯诺的行为为他赢得了地下党的信任。由于宋庆龄的介绍，他在 1936 年夏天受到了陕北红色根据地的欢迎。抵达"苏区"时，他看到一张小小的英文海报上写着：欢迎支援我们革命的美国同志。

他在苏区获得的采访自由度，今天的记者做梦都会羡慕。周恩来亲自为他安排了 92 天的旅程，最后延长到 4 个月。老战士给他讲长征的故事，农民坦率地跟他谈对共产党的看法，晚上他常跟政治局委员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打牌。当然，他也多次跟毛泽东聊到深夜。

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他非常正面地描写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孩子。他从来没在青年当中看到过这样多的"个人尊严"，"他们让你感觉中国还有希望。"他也提到共产党如何消

灭了娼妓和鸦片。他们给农民土地和基本教育。虽然不少农民还是有批评意见，但问起日子是不是比过去强，“回答几乎总是断然的‘那是’。”

尽管心下钦佩，斯诺仍然保留了新闻人的怀疑态度。共产党口中关于国民党暴行的故事，他称之为传言，因为他没有亲眼看到。他为毛泽东写了自传，但在书中他说“严谨地说这是这位中共领导人的一家之见。”（毛泽东通过翻译口述了自传内容）。

回到北平，斯诺开始告诉向学生、学者和记者讲述他的经历见闻，关于共产党，他们从来没听到过第一手消息。国民党政府指责他的报道是“虚假宣传”和谎言，他以照片为证进行了反驳。他许多文章以及《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翻译成中文后非法印行，传遍全国各地。这是他给中国留下的最初的财富。

“因为当时的红色根据地是被封锁的，所以他让红色根据地以外的，也就是中国大部分的人，通过他了解了根据地，了解了共产党的不少人，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影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龚文庠说。2005 年，龚文庠主持了北大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当然最主要一个政治上的影响，是他从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与中国领导人的友谊，跟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新闻界限。包括最高领导毛泽东对他的重视，通过他对世界发言，同时也对中国发言。”

斯诺很清楚这种关系的性质，也很清楚记者需要保持客观和独立。但因为那个时代的特殊，他有意决定跨过新闻记者界限。他相信对这个他已爱上的国家，中国的共产党员是惟一现实的希望。

斯诺写完《红星照耀中国》仅仅三天之后，日本军队进攻北平。他再一次放弃了中立的旁观者角色，尽量帮助周围的人。他的党员朋友托他护送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离开北平，他做到了。1970 年，他们在北京重聚。

“当时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斯诺在自传里写道，“这个态度，是源于我决意致力反对一切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

迫使主席接受崇拜

1941 年，斯诺离开了中国。这位战时记者回到美国，沮丧、瘦弱，存折上只有不到 2000 美金。他的婚姻失败了，他的工作也没有达到他希望的效果。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

漫长的离婚过程结束，1949 年他跟演员洛伊斯·惠勒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但在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时期他养家都困难（洛伊斯因为积极参与民权活动进了行业的黑名单）。大多数美国媒体不愿发表他的作品，他不又愿意改变报道领域或者换个职业。1959 年他们一家四口人搬到瑞士朋友家里，因为欧洲媒体欢迎他的作品。他们常回美国，希望有一天能搬回来，但从来没实现。

1949 年后斯诺好几次想要访华，但中国把那些还不承认新政权的国家来的记者都赶回去了。此外在 1952 年，美国政府限制公民前往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说谁要是去了护照就作废。

1960 年，美国国务院终于批准斯诺以“作家”的身份访华，尽管中国仍当他是记者。此行是在大跃进尾声和中苏关系破裂之前，成果是《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虽然也很重要，但受欢迎程度与《红星照耀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面世的时代美国人期待中共能成为盟友，而前者出版的时代他们已被视为敌人。

很多批评家指责斯诺不去报道饥荒的情况。可是斯诺并没有得到独立调查的许可，人民不愿意放开了谈也令他沮丧。他报道了中国经济困难的状况，但即便那样也比他年轻时了解到的中国强多了，尤其在城市里。

斯诺一共三次访问新中国，所见所闻，让他一次比一次失望。1938 年他和第一任妻子跟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一起建立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意在发展农村经济，为共产党提供战争援助。他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和个人积蓄，运动还获得了毛泽东的赞同。但 1951 年工合运动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终止了（1983 年又重在北京新启动）。他希望用《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的版税负担自己的中国之旅，但发现根本就没有版税。除了极少数在图书馆，1950 年代几乎找不到这本书。完整的中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直到 1979 年才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版，斯诺已去世 7 年。他得知很多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很糟，有的人甚至说，斯诺不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他的《今日红色中国》也被认为“对中国人民不友好”。

最后一次旅行，他抱怨说重要经济和军事问题都得不到回答，还有人民不能开诚布公，包括朋友。也许最令他不安的是对毛主席的极端崇拜，据一位传记作家记载，斯诺说是“把主席强摁在这个问题（个人崇拜）里，直截了当得令人惊讶。”

不过，如果说 1936 年他拿到了“世纪独家”，那么 1970 年他从中国带走了 1970 年代的独家新闻。毛主席告诉他，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无论以“游客”还是“总统”的身份。可是在 1970 年还是有很多美国媒体不肯同斯诺共事。《纽约时报》同意发表他的文章，但斯诺对稿件编发不满意。直到第二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他的文章才发表在《生活》杂志上，但那时尼克松当局说，已经了解到中方的意图。

“最好保持独立判断”

在遗嘱里斯诺写道：“美国栽培养育了我。”他骨灰的一部分葬在纽约州哈得孙河边一个朋友家。他也要求找人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北京，“说我爱过中国。”他的一半骨灰最后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边，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对斯诺的纪念和研究，北京大学都领先全国。2 月 15 日，北大举行了纪念埃德加·斯诺去世 40 周年的仪式，与会者包括前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北大校长、前外交部长黄华的夫人何理良等。2005 年北大举办的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目前是国内最大规模的一次研究会。

美国方面，1984 成立的年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每两年在堪萨斯城举办一次研讨会。这个基金会同时资助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档案馆，保存着他数十年的笔记、日记、照片等等。斯诺在 40 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写了 11 本书，其中 9 本是关于中国的。他在苏联报道二战，并采访国家元首。罗斯福总统几次邀他来访，了解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斯诺预测了蒋介石的垮台和日本袭击美国等事件，甚至在他的左倾观点不受欢迎的时候，仍有很不错的媒体发表他的文章。

“评判埃德加·斯诺作品的绝对正确的方法，应该说他是 20 世纪顶尖的外国记者之一，《红星照耀中国》显然是主要原因。”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行政副校长和教务长约翰·汉密尔顿说。他是近期出版的一本美国驻外新闻记者史的作者，也是斯诺的传记作者。

“但斯诺变成了一个便利手段，用来形容写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出了什么问题，形容共产党出了什么问题。”他说。“许多（西方）人认为他不是独立的、明智的记者，而可能被共产党员利用了。”

在西方，他的重要性就这样被歪曲。不过在中国，人们认为斯诺是独立、聪明的记者，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不持任何偏见。他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毛主席的老朋友”家喻户晓。但这层关系恰恰是他身后争议的核心问题。

“我认为他不想作为毛的朋友为人铭记，这称号常被提起。他不是毛的朋友。他是一个想和中国人民做朋友的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爱中国人民，尤其爱那些积极投身对抗蒋介石治下糟糕社会状况的人。”

“当我们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时候，意思是指，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朋友。”龚文庠说。“斯诺的遗产，我觉得主要是在政治上的遗产。”

2011 年《党的文献》杂志称《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一个典范”。有领导呼吁培养“100 个新的斯诺”，让世界了解中国。但当下的中国并不一定能接受他的新闻遗产。他当初是在另一种的媒体环境工作，他投身政治运动，包括学生运动。

“当时共产党的力量非常小，它的新闻受到严密封锁，中央政府有很严厉的新闻审查。这才有了斯诺这样的人，冲破了审查报道了中国两个政权当中弱小的另一个。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再出现呢？” 龚文庠说。“所以要有一个‘新的斯诺’，就要给他完全不同的定义。这个‘斯诺’要非常勇敢，要不管政府的限制，去报道一个政府不让报道的地方和人民。我想我们的口号，要培养‘新的斯诺’，肯定不是说这种类型的。”

对“斯诺”的任何新定义都将是“互信赤字”的良药。 在 1949 年以前，国民党禁止报道共产党时，在冷战早期美国阻止记者报道中国时，斯诺都是最成功的“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外国记者。 对西方人来说，离开了他当时那个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就无法理解他积极的贡献。但中方也往往忽视到，他同毛泽东的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职业生涯中的客观性，仍然可待商榷。而且，目前没有任何组织预防外文媒体了解中国。

去世 40 年后，他留下的矛盾向我们问道：中国到底想让世界了解她到何种程度?

（魏一帆：南方周末专栏作家。本文为作者直接赐稿。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4/魏一帆：新埃德加•斯诺是否互信赤字的良药）

【返回目录】



10-9 肖同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正是这一年春天，安东尼奥尼接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通过一位政治立场接近的西方著名导演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介绍中国。对于周恩来来说，就像乒乓球外交一样，是当时政治步骤的一招。可惜，安东尼奥尼‘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期望。”

“被误解的马可·波罗”

看安东尼奥尼晚年的影片《云上的日子》，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苦，这位毕生在探究真相的导演，直到晚年仍无法释怀纠缠一生的困惑，对政治、人生、爱情，还有那些森林般生长在心灵边缘的欲望，他都设法通过影像加以探讨。

好奇是一个导演的天性，当 1972 年，整个中国推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我们已很难了解当初中国政府选择他来中国的详细理由，也许意共左翼的背景是唯一的理由吧。

1972 年，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和美国接触，以牵制苏联——在毛泽东的晚年清醒状态下做出唯一的一项划时代的决定后，周恩来抓住机会把中国推向世界。在首都机场，周恩来打破外交礼仪的陈规，撇开他的随从疾步迎向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这次握手双方以跨越太平洋和飞越四十年来概括。这一年，乔冠华在联合国的笑声被西方誉为“震碎了议会大厅的玻璃”。

而正是这一年春天，安东尼奥尼接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通过一位政治立场接近的西方著名导演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介绍中国。对于周恩来来说，就像乒乓球外交一样，是当时政治步骤的一招。可惜，安东尼奥尼“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期望。



《中国》的首播权被美国广播公司购买，率先在电视上与美国人见面，并被评为 1973 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总统尼克松据说两次调看此片。不过后来的结果超出了安东尼奥尼的控制范围，台湾电视台多次播放此片，以此作为反共的重要教材，这一切激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愤慨，《中国》被定性为“一个公开反华、反共、反革命的作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

1974 年，围绕纪录片《中国》，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几乎酿成政治事件和外交事件。这一年，作为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一个重要活动计划之一，《中国》被安排到凤凰剧院上映，惊动了包括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外交官员，来自中国政府的抗议使得意大利政府极为惶恐，虽然极力阻止这部影片上映，当仍然没能如愿，超越政治的艺术节还是促成了影片的公映。多年以后，一位意大利电影评论家阿贝尔托·埃科这样写道：“焦虑不安的安东尼奥尼再次忍受着他的非常个人的自相矛盾的戏剧性事件带给他的痛苦——这位怀着爱慕和尊敬之情前往中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家，发现自己被指责为受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雇用的法西斯主义反动文艺家，引起八亿人民的憎恨。”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否知晓，更强大的舆论压力则来自中国国内，这一年，从中国的权威报纸《人民日报》到各地报刊，一场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席卷全国，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特地结集部分文章出版，题为《中国人民不可侮》。

意大利评论家将安东尼奥尼比喻为“被误解的马可·波罗”，和一千多年前的马可·波罗把中国描绘成人类的天堂一样，安东尼奥尼同样是怀着好奇和热忱来到中国的，在埃科看来，“那些在电视上看到这部片子的人记得，这部片子从一开始就怀着热忱投入到中国的大事中去了，电视的正义之举最终向数百万观众展示了一个实在的中国，一个摆脱了西方宣传模式的充满人性和祥和的中国，尽管中方指责这部影片充满不可理喻的敌意，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这种误解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现代主义电影大师，一位对西方现代工业深怀质疑的艺术家，他眼里的中国显然具有一种人类标本的意义。

“人总是放在第一位”

在片子的开头，安东尼奥尼这样概述他见到的中国：“中国正在打开大门，但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然不得而知，我们到这里只是瞧一眼而已。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安东尼奥尼的低调可见一斑，他只是透过镜头“观察中国人的面目、姿态和习惯”。 他和摄制组一行 9 人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和河

南林县农村待了 22 天，拍了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电影。关于《中国》的主题，安东尼奥尼后来是这样解释的："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人'。我们进入中国，就是记录那里的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然后才是这些人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我尽量去攫取的正是中国工农的日常生活状态。在我的影片中，人总是放在第一位。"

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天安门，镜头里出现的是衣着单一朴实的青年女子，一位神清气闲的长者在打太极拳，人们在王府井路旁歇息，长城上是写生的学生，天坛上游人如织，北京的日常生活恬淡而悠闲；在上海，拥挤的马路上人们被电影的摄影机所吸引，表情好奇而惶恐，这组著名的长镜头记录了马路上的行人、茶馆里的饮茶、饭馆的吃相，安东尼奥尼的摄影机随扬子江水，缓缓流动着，静静捕捉着河岸及船家人的生活。解说词惜墨如金，背景音乐是铿锵激昂的样板戏，提示着很强的时代感，安东尼奥尼的影像本身在深刻地传达人和时代的关系，传达那种蕴藏在平静表面下的神秘和力量。

在苏州的一家叫做复兴回民面店，据称这是整个城市最好的一家饭店，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里是：吃面，抹嘴、抽烟、老人喂孩子，在解说里，他平静地说："他们的生活条件与我们的相差如此之远，使我们感到惊奇。"惊奇之余，安东尼奥尼试图为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找到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比如，传统和现实，比如生与死，比如动与静。

在观察中国传统针刺麻醉的段落中，安东尼奥尼不惜笔墨，详尽纪录了整个治疗过程，他特地用了几个他喜欢的带关系的长镜头把针刺麻醉这门传统的医术与医院环境的关系；与接受麻醉的人的关系微妙地建立起来。这显然已不仅仅是对一项神秘的东方医术的展示，而把这项古老的医术与现代中国人生活联系了起来。

在上海城隍庙的段落中，安东尼奥尼把他的形式风格——环境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发挥。茶、茶楼、老人这些象征传统的元素，与毛泽东画像、宣传画、样板戏音乐这些充满时代感的元素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神秘、而又不失快乐的气氛。在安东尼奥尼眼里："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怀念和欢乐交织在一起，既怀想过去，又忠于现在。"也许，这就是安东尼奥尼理解的中国。

在拍摄以建造红旗渠著名的河南林县时，安东尼奥尼进入了一个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小山村。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个"荒凉和被抛弃的村落"，摄影机随意地在这个山村中游荡着，村

民们紧张地纷纷躲避着镜头，可又抑制不住好奇心。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始终对准这些村民们的四处躲避，隐藏可又抑制不住好奇心的脸。安东尼奥尼试图让自己，或者说让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从这些生动的面孔后面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通过村民们初次面对西方人的行为和表情，安东尼奥尼这样阐述他对这里的认识："这里的人很少离婚，因为夫妻很少吵架"，"由于中国人的贞节和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 安东尼奥尼是凭着直觉和好奇在拍摄，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他本能地躲避来自官方的安排和宣传，希望走进角落和背面，这成为后来中国人耿耿于怀的最主要的一点。

"我只能注视而不能在深层次上阐释"

1974 年 1 月，也就是影片公映的第二年，针对《中国》的批判文章大量地被发表出来。批判的主要观点是：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侮辱中国人民，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影片所具有的冷静旁观的气质，与当时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面貌大相径庭。这个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技巧上，更体现在对纪录电影功能的认识上；而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的批判，也成为当时党内斗争在文艺界的反应。

误解深刻而难以调和，埃科这样总结了安东尼奥尼的观察："这是一个博大而又不被人了解的国度，我只能注视而不能在深层次上阐释。我只知道这个国家长期浸淫在不公正的封建环境里，如今我看到新的公正通过日常斗争开始产生。在西方人的眼里，这种公正或许显得散漫和清贫。但是这种贫困造就了尊严生存的可能，它恢复了一种平静的、比我们更具人性的人的本身，有时它接近我们所向往的宁静，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顽强地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以简单的方式在通常认为是贪婪的领域里解决了财富再分配的问题。我对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搞工业的事例并不感兴趣。我知道他们有原子弹，但是，我似乎更有兴趣向你们展示他们在互相尊重的工作环境下，如何用一些简单的材料建造工厂、医院或者儿童保育中心。我想告诉你那些工作需要付出多少悲伤和汗水，并且告诉你快乐的范畴——与我们不同——那里能够包容一切，大概那种快乐也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带有辩护性质的总结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是过于高深和不可理喻。要知道，就在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时候，苏联国内正在放映一部利用各种素材编辑的电视纪录片《黑夜笼罩着中国》，对中国进行不怀好意的诋毁。中国人无法心平气和地对待一切来自敌对阵营的批评。

今天再来翻看当时对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文字，总让人忍俊不止，南京长江大桥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回忆拍摄这座令当时中国人无比自豪的大桥的经历时说：“我们向他介绍情况，他不耐烦；为他准备的高架车，他不使用。他乘坐汽艇在大桥的江面上转了两圈不拍摄，却要求把汽艇开到远离大桥的下游去，故意从很坏的角度拍了几个镜头，把一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更卑鄙的是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衣服的镜头加以丑化”。闻名中外的红旗渠在影片里只是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山河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1974 年 1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从动机和艺术手法方面这样抨击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影片导演“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拍摄手法上极其反动和恶劣，“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面对上海这样一座“工业化的大城市”，安东尼奥尼企图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是中国的。这显然是在全盘否定和抹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昔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今天的人们已经丝毫不会怀疑安东尼奥尼的艺术动机——想方设法走向真实。这是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本能，安东尼奥尼只是在用他的角度和方式观察中国、表现中国而已，看他的影片，我总是心存感激，感激他为那时的中国留下了另一个角度的记录，可以让我们的后代窥见我们祖先曾经生活的时代。那是人类二十世纪硕果仅存的一个标本，没有人预感到仅过几年，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肖同庆：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纪录片拍摄者。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4/肖同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返回目录】



10-10 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似乎只有在一个商人的视角下，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才能发现中国的意义。《马可·波罗游记》有关中国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1、物产与商贸、2、城市与交通、3、政治与宗教。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

如果从《马可·波罗游记》（约 1298）问世算起，西方的中国形象已经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研究该形象的历史，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问题值得注意：一、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在理论上，它必须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它必须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它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笔者在上述三个层次上，尝试提出并规划该研究中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域。

一

首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 1250 年前后。1245 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0 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归来，写出《鲁布鲁克东行记》。2 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虽然没有踏上中国土地，但他们游记中介绍的“契丹”，确实就是中国。柏朗嘉宾与鲁

布鲁克把“契丹”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开启了马可·波罗前后两个世纪的“契丹传奇”，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大汗统治下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

蒙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从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 1347 年马黎诺里从刺桐登船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到中国的欧洲人，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 100 人。从 1247 年柏朗嘉宾写作《蒙古行记》到 1447 年博嘉·布拉希奥里尼完成他的《万国通览》，整整 200 年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其中包括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诗歌——都出现有关契丹、蛮子的记述。3 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基督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可能是最诱人的地方。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指出，蒙元世纪欧洲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马可·波罗一家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为中世纪的欧洲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使欧洲船只来到明朝中国海岸的这一海上事业的全部活动，应该看作是“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的余波。”4

1250 年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在中世纪晚期的东方游记中，影响最大的数《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马可·波罗游记》是最让西方人想入非非的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似乎只有在一个商人的视角下，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才能发现中国的意义。《马可·波罗游记》有关中国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1、物产与商贸；2、城市与交通；3、政治与宗教。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 17 年，见闻庞杂繁复，然而最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是中国的物质文明。每到一处，他都兴致勃勃地记述当地的物产、建筑、道路、行船与桥梁。中国城市，无论是契丹的汗八里，还是蛮子省的行在（京师），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

契丹传奇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值。契丹蛮子，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物质繁荣。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蒙古治下的中国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欧

洲来说，都算得上是人间天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也需要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因为这是他们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一种启示。物质化的契丹形象可以激发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使其变成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的动力。一个充满财富与权力象征意味的中国形象出现，自有其欧洲文化本身的背景。如果说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它与其说反映了契丹的形象，不如说表现了西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幻想。从中我们既可读到模糊的中国形象，也可以发现投射到中国形象中的西方中世纪文化所压抑的欲望与恐惧。

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的传奇。正如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契丹话语中传奇化的大汗，则成为权力与荣誉的象征。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的文本中，都有对大汗威仪的描述。在大汗的形象中，隐约透露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世俗政治理想。马可·波罗的故事主要流传在南欧、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中世纪晚期的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读另一部流传广度几乎与《马可·波罗游记》不相上下的东方故事——《曼德维尔游记》。1500 年之前，欧洲各主要语种都有了《曼德维尔游记》的译本。今天我们可以见到的《曼德维尔游记》的手抄本有 300 种之多，而《马可·波罗游记》则只有 119 种。遗憾的是，作者曼德维尔爵士是位座椅子上的旅行家，旅行故事都是他虚构的，他将关于东方的新知识与西方已有的旧传说融合在一起，一方面表现了中世纪晚期西方通俗文化层次上的东方意识特色，另一方面又在西方人的知识与想象中，塑造了类型化的契丹形象或东方形象。

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东方知识的百科全书了。曼德维尔也像其他游记作者那样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赞叹中国的物产丰富、城市繁荣，然而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章节里，大汗的故事占去 70%的篇幅。大汗国土广大，统治严明，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像土耳其的苏丹，大汗有 100 多位妻子，大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长老约翰也没有他伟大。 曼德维尔在基督教义与骑士道视野内改造契丹形象。一部游记与一部英雄传奇在中世纪似乎没有什么严格的文类界定，就像虚构与真实也没有什么客观的尺度一样。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契丹传奇将中国塑造成财富与君权的象征，表达了资本主义早期萌生的世俗精神。文本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的形象，又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精神的象征。二者的关系是一种无意识的隐喻关系。当他们议论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遍地财富、

城池众多、道路纵横时，他们也在体验自身的缺憾、压抑与不满，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向往。5

二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在理论前提上。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有真理与错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文化的表述 6，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就不必困扰于西方的中国观是否“真实”或“失实”，而是去追索西方的中国想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延续的。蒙元世纪大旅行草草结束，但西方关于中国的乐园传说，却在社会不同阶层间流传，直到伊比利亚扩张，从“世界上最远的海岸”（指中国）带回最新的消息。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个浪漫的时代，新消息与旧传说、知识与想象、虚构与真实，使人们的头脑与生活都分外丰富。尽管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传奇与历史混杂，甚至许多欧洲人还无法判断契丹或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中的国家，但理想化的“大中华帝国”的形象已经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契丹传奇的继续，但已经有了更多的历史意义。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出版，标志着契丹传奇时代的终结。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西方文化开始将中华帝国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他们自身文明的文化乌托邦。这既是一次发现又是一次继承，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越来越多地渗入中国形象，一个财富与君权的物质化的契丹形象转化成一种文化智慧精神与道德秩序的中华帝国形象，契丹神话中的某些因素被遗忘了，某些因素又被植入新的中国神话中，当他们描述中国人口多、国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错、财富丰足时，我们感到契丹神话仍在继续。而当他们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勤劳时，我们又感到一种新话语或新神话的诞生，因为后者的精神价值明显高于物质价值。

中国形象从西方的地理视野进入哲学视野，从物质欲望进入文化向往。门多萨神父奠定了大中华帝国形象的基础，以后金尼阁、卫匡国、基歇尔神父又不断丰富，敏感开放文艺复兴文化首先从宗教、历史、文化、人性等角度为中西文明确定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可能是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也可能是人文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总之，一个共同的起点是文化理解与利用的前提。当传教士们穿凿附会地证明中国民族、宗教、语言的神圣同源性时，哲学家们也开始思考这种同源性是否可以引渡到世俗理念中去。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导是否有共同的含义？中国的城市管理是否可以作为欧洲城市管理的范型？由伦理观念规范的社会秩序是否可以代替法律的约束？由文人或孔子思想培养出的哲学家管理国家，是否可以成就一种现世理想？7 西方开始在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的文化背景中，在乌托邦想象的传统视野中，构筑并解读中国形象的文化意义。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

中国以“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早期启蒙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中，标志着欧洲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启蒙哲学家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孔教乌托邦的观念与制度原则中。这是他们利用中国形象将乌托邦渡入历史的主要依据。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乌托邦将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地图上移到启蒙运动中的世界历史中，证明乌托邦具有地理与历史的现实性，是历史的机会。“孔教乌托邦”体现着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如果欧洲君主都像中国皇帝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不再是乌托邦了。改造世界从改造君王开始，启蒙主义者期望通过理性的建立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的君主，成就人类幸福与正义。启蒙主义者都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坚信，人一旦掌握并运用了理性，所有的乌托邦都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变成现实。孔教乌托邦成为启蒙主义者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8

三

我们在一般社会想象意义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注的问题是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不仅涉及不同时代流行的特定的中国形象如何表述如何构成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

的方式，揭示西方中国形象叙事中那种普遍性的、稳定的、延续性的特征，那种趋向于套话或原型的文化程式。从 1250 年前后到 1750 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断被美化；从早期资本主义世俗精神背景下契丹传奇，到文艺复兴绝对主义王权期待中的大中华帝国神话，最后到启蒙理想中的孔教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化的一致性与延续性来。解释这种形象及其传统的意义，除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早期的中西关系之外，还有西方现代的文化心理结构。

西方美化中国形象的传统在“中国潮”9 世纪达到高峰，“中国潮”开始于 1650 年前后，结束于 1750 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10

“中国潮”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中国潮”的发起人主要是商人与传教士。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在欧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国潮”的时候，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也在欧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种“中国潮”。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中国时尚。传教士们从中国回来，便成了社会名流，他们穿着中国长袍，谈论圣明的康熙大帝与玄妙的孔夫子哲学。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在社会上流传，激进主义者感到兴奋，正统主义者感到恐慌。哲学家们不甘寂寞，也参与到中国哲学是否无神论的讨论中来，有些人甚至冒险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国道德哲学取代基督教神学。莱布尼茨曾说：“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伏尔泰准确地发现中国文明在欧洲的利用价值。“……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们……。”11

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启蒙哲学家，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判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

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西方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形象已经经历了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12

“中国潮”是契丹传奇以来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的高潮。“中国潮”在启蒙运动中期达到顶峰，退潮也开始了。人们普遍注意到，1750 年前后，欧洲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突然出现，瞬间完成的，但转变的幅度依旧令人吃惊。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代结束了。欧洲文化当年对中国的热情几乎荡然无存，如今除了贬抑与厌恶之外，更可怕的是遗忘。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普遍关注这次转变，但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还不是这次转变如何发生，而是要解释这次转变何以发生。

四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更多地属于观念史或知识社会学研究，它试图从历史中不断变化的、往往是非连续性的观念与想象中，寻找某种文化策略与逻辑。文本是唯一的依据，而作为文本的语境出现的现实，在此也不是指文本所反映的现实对象（如中国），而是构成文本写作的社会语境与话语策略（西方文化）。西方的中国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启蒙运动中中国形象逐渐转变，造成这种观念变化的，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的文化精神与中西贸易与政治军事关系方面的变故。可以这样说，真正使中国形象改变颜色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启蒙运动文化观念本身的进步，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开明专制主义到共和主义、从传统的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到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法国开始大革命，封建专制的中华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楷模了。二是西方扩张中与中国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异域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与想象；二、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三、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述或象征。赛义德在对东方学概念进行限定性说明时，强调异域想象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特定时代东西方之间存在的那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决定着西方“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13 在此意义上，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与转化、断裂与延续，也不仅是纯粹的观念与文化的问题，而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紧密关联。

首先是西方现代扩张史上中西权力关系的变化。西方的中国形象与西方的现代扩张的历史，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蒙元世纪西方人走向世界，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出现了。1250 年是西方人的世界知识的起点，也是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起点。蒙元世纪西方的大旅行瞬间开始又瞬间结束。蒙古帝国崩溃、奥斯曼土耳其扩张，又将西方压制在欧亚大陆的西北角，知道新航路发现，西方扩张在西半球与东半球同时开始。他们征服了美洲，但在亚洲的经历却并不顺利。葡萄牙开辟了以果阿为中心的东方贸易网，荷兰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个贸易网，将中心从印度西海岸移到更远的东南亚的巴达维亚，并且使贸易更加系统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西方扩张势力只在亚洲边缘建立了一些贸易点和军事要塞，而且除了在东南亚，所有这些贸易点或军事要塞都岌岌可危。可以说，直到 18 世纪，东西方势力对比中，东方相对而言依旧强大。亚洲的游牧文明扩张达到历史的高峰，他们在波斯建立了萨菲帝国，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中国建立了满清帝国。这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结合的东方帝国，虽然在经济技术上都已相对停滞，但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的扩张仍在继续。

中国潮在欧洲出现的那个世纪里，西方扩张进入了一个停歇与调整期。1650 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衰落，西方扩张的第一次高潮已经结束。西方进入东方的扩张势力，基本上被阻止在东方帝国的海岸上。这种局势直到 1750 年前后发生转变。此时，欧洲已经能够大批生产瓷器，工艺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基本上可以满足西方社会的需求，无须再大量地从遥远的中国高价进口。瓷器的价格跌落了，进入寻常百姓家，漆器壁纸的欧洲产品甚至比中国进口的还优秀。英国人喝茶上瘾，商人们大量贩运茶叶，1716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与广东的直接贸易，茶税从世纪初的 100%降到世纪中的 12.5%，茶价一路下跌， 1750 年英国年进口的茶叶已达到 3700 万磅，茶也成了寻常百姓的日常饮料。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国人需要的东西：鸦片。他们将印度的鸦片运往中国贸易茶叶，英国对华贸易出现顺差。英国东印度公

司基本上控制了印度次大陆，欧亚贸易中亚洲从出口成品到出口原材料，欧洲不仅占有经济优势，而且也表现出政治军事优势。欧亚贸易已从重商主义自由合作贸易进入帝国主义殖民劫掠贸易时代。试想一个贫困的、出产廉价产品和原材料的、被掠夺的、即将被征服的国家，能够令人仰慕令人重视吗？欧洲的中国形象与欧洲的中国茶同时跌价。人们可以追慕那些富裕先进的国家民族的习俗风格，但不会效仿落后堕落的国家的生活、思想与艺术风格。

1750 年前后在西方扩张史、东西方关系史和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750 年前后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扩张的第三波开始。同时，衰落出现于所有的东方帝国，首先是萨菲王朝，其次是莫卧儿、最后是满清帝国。世界格局变了，英国军事与经济实力已强大到足以打破旧有的平衡。在整个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及时避免了革命的消耗，又放弃在欧洲争取霸权，他们一边发展国内经济，一边继续海外贸易，加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他们在美洲与印度战胜了法国人，普拉西战役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化统治的建立，对英国本土来说，有助于完成工业革命，对东方扩张来说，赢得了打开中国的基础。首先是英国人用印度的鸦片扭转了西方三个世纪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其次是英国以印度为基地，用印度的补给与雇佣军赢得了鸦片战争，西方持续三个多世纪向东方扩张的进程临近完成。在世界现代化竞逐富强的进程中胜出的西方，还有可能继续仰慕一个愚昧专制停滞衰败的东方帝国吗？

其次，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变化，也是中国形象转型的重要原因。现实世界中西方物质权力关系，影响着西方表述中国的话语模式。西方的中国形象在 1750 年前后发生转变，是有其深远的现实政治与经济原因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西方文化心理本身的结构变化方面的原因。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它并不一定再现中国的现实，但却一定表现西方文化的真实，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现代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揭示出西方社会自身所处的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博岱在《人间乐园》一书中提出，考察近现代欧洲与非欧洲人的关系，应该注意到两个层次与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层次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观念的、文化的或神话的层次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层次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14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认同与世界规划的组成部分。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推进，起初是贸易与传教，启蒙运动之后，又自命肩负着传播推行现代文明的使命。这种扩张是自我肯定与对外否定性的。外部世界是经济扩张军事征服政治统治的对象，也是传播基督教或推行现代文明的对象。但同时，西方文明在观念与心理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冲动，这是一种自我否定与对外肯定的心理倾向。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的东方神话。而东方神话也是理解西方历史上中国崇拜的一个必要的心理文化背景。

东方神话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源头，两希传统（古希腊与希伯莱）中都具有深厚的东方情结。古希腊文明来源于近东文明，对于东方世界，古希腊文化心理中既有恐惧又有向往。这种心理延续到中世纪，恐惧来自于伊斯兰威胁，向往则指向传说中盛产黄金的印度与长老约翰的国土，马可·波罗的契丹传奇又将这种东方向往转移到中国。中国变成西方想象中的世俗天堂。地理大发现是一场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西方对自身、世界、历史的看法。改变对自身的看法是，西方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也不是最优秀的文明，由此形成一种宗教与文化上的宽容精神，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在于发现世界是人的世界，由不同民族国家习俗法律组成，不是人与怪物的世界，改变历史的看法在于，历史体现为一种文明的进程。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观点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在启蒙运动中达到高潮。

东方神话发动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似乎又确证了东方神话。当大中华帝国作为优异文明或现世乌托邦出现在启蒙文化中时，中西关系在观念心理层次上对西方文化的巨大的“现实价值与神话般的力量”就实现了。中华帝国在社会生活方面，它是时尚与趣味的乐园，在思想文化上，它是信仰自由与宽容的故乡，在政治制度上，它是开明君主制度甚至哲人王的楷模。东方产生优异的文明。东方神话在中华帝国形象中获得了某种新的、现实的解释。启蒙运动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启蒙主义者相信，对广阔世界的了解、能够使他们更好地认识与改造自身的文化。在启蒙理性的背景上，有一种深厚的乌托邦冲动与浪漫主义精神。他们不仅仰慕中华帝国的文明，甚至以伊斯兰文明批判欧洲文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扩张征服外部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却敬慕颂扬这个正不断被他们征服的世界。在东西关系上，现实层次与观念层次的倾向完全相反，但又相互促进。对东方的向往与仰慕促动政治经济扩张，扩张丰富的东方器物与知识，又在推动已有的东方热情。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又相辅相成，这就构成一种历史张力。



1750 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随着西方整个的东方主义话语的转变而转变，这里除了东西现实权力关系的变化外，西方现代性文化结构自身的变化，也不可忽视。西方现代性从早期开放的解码化的时代进入逐渐封闭的再符码化时代。明显的标志是：一、“古今之争”尘埃落定，明确现代胜于古代，今人胜于古人；二、地理大发现基本完成，世界上再也没有未发现的土地，而在已发现的土地上，还没有人间乐园；三、西方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西方摆脱中世纪以来那种对神圣、对古代、对异邦的外向型期望与崇拜。西方文化视野从古代异域转向现代西方，价值取向也向心化了。启蒙哲学家在理性启蒙框架内构筑的世界秩序观念，是欧洲中心的。首先是进步叙事确立了西方的现代位置与未来指向，所有的异域文明都停滞在历史的过去，只有西方文明进步到历史的最前线，并接触到光明的未来。然后是自由叙事确立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西方之外的国家，都沉沦在专制暴政与野蛮奴役中，最后是理性叙事，启蒙精神使西方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一片光明，而东方或者整个非西方，依旧在愚昧与迷信的黑暗中。在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价值秩序中，中国形象逐渐黯淡了，马可·波罗时代以来 500 年间西方美化的中国形象的时代也结束了。

五

尽管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生成与变化，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相关联，但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系统，最终来自西方文化本身，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意识与无意识。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现代性是一个核心概念。一则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并且与西方现代历史具有相同的起点 15；二则是作为西方现代文化自我的投射，西方的中国形象只有在西方现代性叙事语境中，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西方曾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代开放的现代性叙事中赞美中国，又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自足的现代性叙事中批判中国。启蒙大叙事 16 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与自由为价值尺度的世界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的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为文明或野蛮，优等或劣等，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专制中的民族，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就成为正义的进步与自由的工具……

西方现代性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关系。中华帝国在精神上是愚昧的、道德上是堕落的、政治上是专制的、历史上是停滞的，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诸如理性、素朴、自由、进步等完全相反。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

如果说 1250 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 年则是其间最重要的转折点。否定的中国形象出现于 1750 年前后，标志性的时间或文本，是 1742 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旅行记》出版与 1748 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环球旅行记》介绍的那个贫困堕落的中国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分析的那个靠恐怖的暴政统治的中国，逐渐改变着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印象。此后的一个世纪间，邪恶堕落的东方专制帝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被加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没有明显的经济与政治效果，文化作用却很大，使团带回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足以“令中国人名声扫地”。半野蛮的专制帝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行将覆灭，那里“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中国形象终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封闭、停滞、邪恶、堕落的鸦片帝国，沉入西方想象的东方黑暗的中心。

西方现代早期的那种外向超越、离心开放的价值取向，在启蒙运动中发生变化，18 世纪后期出现的否定的中国形象，到 19 世纪达到高潮。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特征，主要表现在东方专制愚昧、停滞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上。进步与自由又是西方现代性“大叙事”中的核心概念。中国形象作为“他者”，正好确定了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对立面：停滞与专制。在西方现代文化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意义就是表现差异，完成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认同。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

文明停滞的中国形象出现于 18 世纪末，其出现的语境是启蒙主义以欧洲的进步为核心的世界史观。在这一语境中，他们确定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探讨停滞的原因，即可以证明西方文化的价值与优胜，又可以警戒西方文化不断进取，并为西方扩张与征服提供意识形态根据。西方曾经羡慕中国历史悠久，但很快发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正在堕入野蛮的国家。文明的悠久与停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当历史悠久同时意味着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孔多塞与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转

折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的中国文明特征：停滞与衰败，以及停滞与衰败的原因：东方专制主义的愚昧暴政。17

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出现于启蒙运动后期的法国与英国，到 19 世纪初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最完备的解释，从而作为标准话语定型。它既表现为一种具有教条与规训意义的知识，又表现为具有现实效力的权力。在理论上说明中国的停滞，进可以为殖民扩张提供正义的理由，退可以让西方文明认同自身，引以为戒。永远停滞的民族，自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只能成为其他民族的一面镜子。永远停滞的民族，自身也不能拯救自身，只有靠其他民族的冲击。进步是人类历史的法则，停滞是取得共识的“中国事实”。一旦这些问题都确定了，西方入侵中国就可能成为正义之举，在观念中唯一的障碍，如今只剩下人道主义在历史中设置的道德同情。

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提供了思想武器，但并没有完成其必然的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进化概念取代进步概念，避免了启蒙思想的温情，进化的过程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残酷过程，适者生存，不适者就不生存，在进化的普遍法则中，过程的残酷与痛苦都是必要的。优等的欧罗巴民族创造的优秀的西方文明，最终消灭取代劣等的东方民族及其停滞落后的文明，就不仅是一个必然的进程，而且是正义的。文明的进行曲由优等民族的凯歌与劣等民族的呻吟合奏，一半是创造，一半是毁灭。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科学中的“适者生存”的观念植入社会科学解释历史的发展，“进步”变成了“进化”。表面上看，它更科学了，实质上，在科学的面具下，知识已偷渡成意识形态。

犹如进步与自由是启蒙大叙事的一对紧密相关的肯定性概念，停滞与专制也是一对紧密相关的否定性概念。笔者追溯古希腊开始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所谓“观念史过程”，指出从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收编”中国形象。首先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勉强断定：“从各方面看，中国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然后是尼古拉?布朗杰的《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断定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上，自始至终都是专制主义的。黑格尔则毫不客气地总结：中国政体是东方专政政体中最坏的，中国是“十足的、奇特的东方式国家”！十足意味着它是东方专制国家的极端形式，奇特意味着中国的专制政体自有其特色，就是家长式专制。中华帝国专制的“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民族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西方思想界不断确定中国形象的东方专制主义内容。中华帝国东方专制主义

形象最后不仅被纳入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而且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代表。黑格尔标志着西方的东方主义传统视野内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神话的终结。

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形象一旦确立，在不断传播、重复的同时也不断确定、丰富，逐渐普遍化、自然化为一种“常识”，作为话语将全面地左右着西方社会的中国的视野与个别文本的话题与意义，以致于实践领域的中西关系或西方对华政策。话语指历史中生成的有关特定主题的一整套规训知识、发挥权力的表述系统。话语假设语言与行为，观念与实践都是不可分的，话语不仅决定了意义与意义表现的方式，还决定了行为的方式，甚至行为本身也是话语。西方的中国东方专制主义形象将中国确定在对立的、被否定的、低劣的位置上，就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福柯认为话语中知识 / 权力是不可分离的，知识不仅假定“真理”的权力而且使权力变成真理。一旦你确立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观念，并肯定民主消灭专制，文明征服野蛮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如果再将中国形象定位在专制与野蛮上，西方掠夺性的野蛮战争就获得了“正义”的解释与动机。

六

我们在三个层次上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首先，探讨马可·波罗时代以来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观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在何时又如何生成的，在什么社会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的；其次，分析西方关于中国的中国形象叙事的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以及该体系在空间上的扩散性与时间上的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表现出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成为一种文化程式，又如何控制个别文本表述的；最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暗含的权力结构，分析它作为知识与想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渗透权力并发挥权力，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并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的物质与文化霸权的。

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在东方主义话语体制中表述中国，黑暗、愚昧、堕落、残酷、恐惧，永无变化的停滞与单一性，不可改变的野蛮……如此类型化的中国形象，出现在传教士的社会历史著作中，出现在文学家的虚构作品中，也出现在哲学家严肃的思考中。不同叙述者可以有不同的知识与经验背景，有不同的动机与方法，应用不同的本文形式甚至讨论不同的主题，但他们表现的中国形象，却有惊人的相似性。西方从 1750 年前后开始经营起的反面的中国形象，

最终完成在两次鸦片战争间，而且一直到 20 世纪初，都没有什么变化。赛义德的《东方学》研究东方学作为一种学科知识是如何向政治权力领域“分配”的。构筑东方专制主义形象的是哲学与政治学，构筑停滞的帝国形象的是历史学，与此同时，人类学视野也在构筑所谓中国的国民性神话，塑造出另类化丑化的中国人的形象，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格局中确立所谓的人种志特点。20 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反思 19 世纪人类人类学知识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过程时发现，它与西方的殖民扩张、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研究将西方赋予殖民地民族的种种“他者”特征“本性化”为所谓的民族性格，从而将历史秩序自然化。18

西方构筑的停滞专制的中华帝国形象，是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塑造一个被否定的、邪恶的中国形象，不仅为鸦片战争与殖民统治掩盖了毒品贸易与战争的罪恶根源，而且为掠夺与入侵提供了所谓“正义的理由”；不仅赋予西方帝国主义者以某种历史与文明的“神圣权力”，而且无意识间竟可能让西方霸权秩序中的受害者感到某种“理所当然”。这种定型化或类型化的中国形象，与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扩张同时出现，不仅说明现实权力结构在创造文本，文本构筑的他者形象也在创造现实，巩固这种秩序。这是话语的权力层面。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表述西方集体无意识中文化他者的话语，都超越了所谓观念诉求的客观认识与真伪之辨。西方的中国形象，1750 年前后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最终不是因为中国的变化，而是西方文化本身的变化；不是西方的认识能力问题，而是西方的表述差异问题。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关键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研究西方文化生产与分配中国形象的机制。

曼海姆对人类知识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发现，一切知识，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其想象性的内在逻辑起点，或者是乌托邦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其差别只在于知识与现实秩序之间的关系。乌托邦是否定现实秩序的，而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实秩序的；乌托邦指向未来，而意识形态巩固过去。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在历史过程与逻辑结构中，都是一对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转化的范畴，与现存秩序一致的统治集团决定将什么看作是乌托邦（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思想）；与现存秩序冲突的上升集团决定将什么看成意识形态（关于权力有效的官方解释）。如果上升集团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动成为统治集团，

它曾经拥有的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意识形态；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乌托邦可能转化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也可能取代乌托邦。19

曼海姆依旧在“知识”意义上分析乌托邦与意识形态，而保罗·利科尔则直接将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分析运用到“社会想象”中。因为知识本身就在表述人们与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直接用“社会想象”可以避免传统的认识论的真假之分，就像阿尔杜塞用想象定义意识形态 20。利科尔指出，社会想象实践在历史中的多样性表现，最终可以归结在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两极之间。乌托邦是超越的、颠覆性的社会想象，而意识形态则是整合的、巩固性的社会想象。社会想象的历史运动模式，就建立在离心的超越颠覆与向心的整合巩固功能之间的张力上。21

曼海姆与利科尔有关社会知识或社会想象的两极类型理论，为我们理解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解释框架。1750 年之前美化的中国形象，是一种充分乌托邦化的文化“他者”，寄托着西方文化不同层次的理想，教士、哲学家、政治家与商人们，都在用中国形象表现他们对西方社会的不满与期望。启蒙运动后期，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乌托邦转化为意识形态，西方社会想象不再是用中国形象衡量并批判西方现实，而是以西方现实为尺度衡量并贬低中国。低劣黑暗的中国形象，从各个方面，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哲学，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证明西方向中国殖民扩张的正义性。如今，传教士反复强调中国人道德败落、心灵阴暗，证明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哲学家们一再分析中国社会贫困、政治专制、历史停滞，甚至种族低劣，这样，西方征服中国并改造中国，就成为文明征服野蛮、自由与进步取代专制与停滞的启蒙正义之举，体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1750 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这次转折并非一劳永逸。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并非从此漆黑一片。19 世纪帝国主义高峰时代，曾经美好的中国形象，作为东方情调隐入浪漫的、纯粹文学性的幻想中。美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主义审美期望中复活了。这是另一种启示意义上的“孔教乌托邦”，其社会感召力是非现实的或逃避现实的，是超验神秘的或非理性的。正如所有关于异国情调的幻想一样，是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我们认定有关中国的离奇神秘、异国情调的幻想，也是一种乌托邦。它放弃了启蒙运动中试图进入现实权力中心的那种政治冲动，以美学的形式与现实形成“疏离感”， 在现实权力的边缘反叛中心。审美幻想与既定现实的距离，是

“自由的距离”。在那个遥远的浪漫空间里，幻想的主权可能瓦解现实的体系及其意识形态基础。22

现代性既表示一段时间，又表示一种明确对应着该历史时间的观念。这种观念由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两方面构成，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容。它出现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已基本形成。其中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意义是：以自由批判的理性为主导，追求知识与财富，通过教育与民主达成社会和谐，完成历史的进步。现代主义的核心意义是现代性造成的社会断裂，可以通过审美批判超越。23 美好的中国形象的特定侧面，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在西方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化期望中显现出来，遗憾只是影响的范围与时间都非常有限。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关于“他者”的想象性表述，其意义与功能，表现在西方文化自我向他者“投射”的关系上。正如巴柔所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24 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肯定否定两种类型间反复，实际上是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调节自身，实现其颠覆与批判、维护与确认西方文化自我的功能。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者是美好的、乌托邦性的，或者是被否定的意识形态化的，超越颠覆或整合巩固，意义都在西方文化本身。我们的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观察到中国形象的断裂与延续，看到话语意义变迁的 “潜在的语法”。

七

我们很容易为西方的中国形象下一个赛义德式的定义：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与“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中国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辞技巧，体现出观念、文化和历史中的权力结构，不断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在此定义的前提下开展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可以将七个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看作一个连续性整体，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展开，延续变化但又表现出某种结构性特征的、由各种不同的印象、想象、比喻、象征、观点、判断等构成的织品。在这一整体性的中国形象话语中，许多思潮是纵横交错的，同一素材在不同时代不同视野中，可能显示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因此，我们研究的问题与领域，不论是断代还是专题，都难以做到界限清晰，不仅素材是相互交织的，观点也相互关联。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所指，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虚构的空间，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两种中国形象的转化，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发生在 1750 年前后，启蒙运动的高潮时代。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20 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依旧表现出两种类型，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从一种莫名的恐慌开始，到另一种莫名的恐慌结束。25

20 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黄祸”传说与义和团的恐怖故事中开始，但同时也有像《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作品，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园，让黑暗的中国形象边缘泛出光亮。西方知识精英曾想象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活的宁静和平的旨趣，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这种最初只限于知识精英圈子的“遐想”，在 30—40 年代赛珍珠的小说与亨利·卢斯主持的《时代》、《生活》对中国的报道中，找到了大众的表达式。但这段“闪亮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40 年代后期到 50 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从光明陷入黑暗。红色中国在西方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与信仰。到 60 年代中国形象又逐渐由暗复明，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甚至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我们分析不同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一个时代西方的某一种中国形象错了而另一种就对了，一种比另一种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图对其二元对立的两极转换方式进行分析，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结构原则。其中反复出现两种极端类型表现出的二元对立原则以及两种相反的中国形象对西方文化认同与超越的功能，才是我们研究的理论前提与宗旨。“毛主义”的红色乌托邦在 70 年代后期又遭到破坏， 80 年代的中国形象乍明还暗，一方面是西方这一时期的中国想象一直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80 年代是“后文革时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西方眼里正使中国愉快、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然而，新幻象在一夜间破灭，90 年代以后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似乎又进入

新一轮的否定化阶段，世纪末的“中国威胁论”像世纪初的“黄祸论”一样，令西方感到恐慌。

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话语的产物。这种话语可能断裂性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变化甚至完全相反，也可能在变化中表现出某种原型的延续性。20 世纪中期一位美国记者对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做调查时指出：中国具有两种肯定与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26 20 世纪末，这种总结基本上被证明无误，另一位研究者发现，20 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依旧在传统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无知、误解、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依旧是美国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基础。27 令人困惑的是，即使已近“地球村”时代，世界上信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依旧那么隔膜、陌生、无知，即使是那些有直接中国经验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与了解，也有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想象与误解。这是令人失望的，甚至对世界未来大同幸福的美好前景产生怀疑。《被误解的中国》写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重点在 30—70 年代间。科林·麦克拉斯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修订版，1999）则写到 90 年代末，重点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而他认为，即使在最后这 20 年，西方的中国形象——以美国为主——也发生了一次两极间的剧烈摇摆，转折点在 1989 年。麦克拉斯认为 20 世纪末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世纪间最复杂的，明暗毁誉参半。28 实际上我们从 20 世纪中国形象整体或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整体上看，20 世纪最后 25 年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恶化”的。80 年代的中国形象始终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故事的阴影中，90 年代又笼罩在 6．4 事件与中国威胁的阴影下，在 20 世纪内，它是 50 年代邪恶化红色中国形象的继续；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它是 1750 年之后丑化中国形象的传统的继续。

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容性。20 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近千年历史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其中有一些客观的知识，但更多的，尤其是在情感领域中，都是那些产生自独特的心理原型的幻想。西方人正是根据西方精神或文化传统无意识中的原型来规划世界秩序“理解”或“构筑”中国形象的。这种原型是具有广泛组织力与消化力的普遍模式，任何外

部知识都必须经过它的过滤与组构，变成可理解的形象。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形象这一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异域经验模式，使任何中国的“事实”本身都失去自足性，必须在既定原型框架中获得改造与装扮，以充分西方化的、稀奇古怪的形象，滋养西方人的想象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系统。中国，这个飘浮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的“他者”形象或异域，只有在为西方文化的存在提供某种参照意义时，才能为西方人所接受。

中国形象塑造了西方文化想象的异己世界。它帮助西方文化确定自身存在的位置、意义，确定他们自己历史的起点与终点。或许西方文化根本就不需要中国的现实，除非是中国成为一种虚构，成为他们能够观照自身、理解自身的幻镜，让他们从中看到他们欲望的天堂或者恐惧的地狱。在 20 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的浪潮中，就像在 19 世纪殖民主义浪潮中一样，中国作为他者，依旧是被排斥、被否定、被贬低、被恐惧的对象。西方未曾改变，中国形象也从未被改变过。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极权主义倾向，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彻底。21 世纪的第一年，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为中文版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写的序言中说：“我对中国实际上了解多少？把中国置于难以捉摸的神秘他者之境，这种貌似谦逊的姿态难道不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神秘化吗？因而惟一要做的诚实之事，就是以此“前言”致力于回答如下问题：如何与这个他者建立起真正的关联？”29

注释:

1 马可·波罗时代之前，西方就有关于中国的传说，我们从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知道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说法”，笔者在《永远的乌托邦》一书里，也从古希腊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但这些传说毕竟虚无缥缈、难以稽考，甚至经常难以确定地理与国家所指是否中国。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将此前西方关于中国的的传说，当作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史前史，一则是因为蒙古帝国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西方第一次有可能“发现”与“发明”中国，一时间出现许多表述中国的文本，而且这些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已经表现出某种套话性或话语性，不外是重复强调大汗的帝国疆土辽阔、物产丰富、君权强大，二则，此时出现的中国形象，不仅指涉明确、特征鲜明，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大中华帝国的神话，从马可·波罗时代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早期，虽然强调点有所变化。三则，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西方文化开始将中国作为文化他者，想象构筑一个具有确定乌托邦或意识形态意义的中国形象。比如说，马可·波罗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早期的世俗精神、绝对主义君权、海外扩张欲望的隐喻。

2 参见《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 年版。

3 这些文本现存的主要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247 年）、《鲁布鲁克东行记》（1255 年）、《马可·波罗游记》（约 1299 年）、孟德·高维奴等教士书简（1305—1326 年）、《鄂多立克东游录》（1330 年）、《大可汗国记》（约 1330 年）、《通商指南》（约 1340 年）、《马黎诺里游记》（1354 年）、《曼德维尔游记》（约 1350 年）、《十日谈》（1348—1353 年）、《坎特伯雷故事集》（1375—1400 年）、《克拉维约东使记》（1405 年）、《万国通览》（1431—1447 年）、《奉使波斯记》（1436—1480 年）。这些文本的作者有教士、商人、文学家；文体有历史、游记、书信、语录体的记述（后者如《万国通览》），还有纯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既有高雅的拉丁语，也有通俗的罗曼语或法-意混合语。至于文本的内容，既有记实、也有虚构，而且经常是记实与虚构混为一体。

4 《欧洲与中国》（英）赫德逊著， 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 年版，第 135、137 页。

5 详见《契丹传奇》，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04 年版。

6 霍尔研究文化的意义时使用“表述”(representation)，他认为“表述”是同一文化内部成员生产与交换意义的基本方式，它将观念与语言联系起来，既可以指向现实世界，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参见 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edited by Stuart Hall,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Chapter Ⅰ, “The Works of Representation”。

7 详见《大中华帝国》，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04 年版。

8 详见《孔教乌托邦》，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04 年版。

9 17—18 世纪间，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称“中国潮”（Chinoiserie）。它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

10 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by Adolf Reichwei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 1925,P25-26.

11 《莱布尼茨和中国》，安文铸等编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8 页。

12 详见《世纪中国潮》，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04 年版。

13 《东方学》，（美）爱德华· W· 萨义德著.，王宇根 译，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 8 页。

14 参见 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lmages of Non-European Man, by Henri Baudet, Trans, by Elizabeth Wentholt,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15 笔者认为，西方现代的起点在 1250 年，而不是 1500 年。参见拙文《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他者》，《粤海风》2003、3。

16 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又称元叙事（Meta-narrative），指统摄具体叙事并赋予知识合法性的某种超级叙事，如启蒙运动构筑的有关现代性的一整套关于理性、自由、进步、人民等主题的宏大叙事，不仅确立了知识的规范，也确立了权力的体制。因此，大叙事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主宰叙事”(Master narrative)。 参见《后现代状况》，（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年版。

17 参见拙文《停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书屋》，2001、10。

18 参见《鸦片帝国》、《第二人类》，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04 年版。

19 参见《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卡尔·曼海姆 著，黎鸣、李书崇 著，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四章。

20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表现系统包括概念、思想、神话或形象，人们在其中感受他们与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参见“Reading ‘capital’” by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1979, “Introduction”。

21 Lectures on Ideology and Utopia, by Paul Ricoeur, edited by George H. Tayl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p194-7.

22 参见拙文《东风西渐：从孔教乌托邦到红色圣地》，《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1。

23 参见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Self, by Gerard Delanty, SAGE Publications, 2000, Chapter 1: The Discourses of Modernity: Enlightenment, Modernism and Fin-de-Siecle Socialogy.

24 《形象学理论研究：从文学史到诗学》（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著，蒯铁萍译，《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02 页。

25 参见《龙的幻象》，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04 年版。

26 《美国的中国形象》（美）哈罗德·伊萨克斯著，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 年版，第 77—78 页。

27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By Steven W. Mosher, A New Republic Book, 1990, 上述观点参见该书第 1－34 页：“Prologue”与“Introduction”。

28 参见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By Colin Macker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rt II: Western Imag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9《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版，“中文版序”。

（周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4/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刘岩川：美国研究者如何应对复杂的中国政治

希望之后有担忧，担忧之后又有希望。总而言之，中国复杂的现状越发让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人看不懂了。从阳光的一面讲，中国早已跨进世界贸易组织，并且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还发射了载人航天器—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实力远胜当年。而与此同时，严峻的就业形势、严重的环境污染、蔓延的腐败现象、普遍的社会不公等等一系列问题，又把中国推向了火山口。复杂的现实给美国观察者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以致他们对有关中国的研究常常得出差之千里的结论。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从未轻松过。2011 年秋天，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学者李成对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总结。据他回忆，过去中国问题研究的最大困难是信息匮乏。以那些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美国研究者为例，在信息几乎隔绝的时代，他们的工作就是做无依据的猜测。但是这种情况在过去十年有了极大的改观，因为外国观察家可以通过许多网上渠道了解中国军事发展的情况，比如军官的生平、进口武器的活力、海军发展的目标等等。

李成说，现在丰富的研究资料来源于网络的兴起、中美的频繁交流和中国内部的信息流通。例如，自从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出版自传以来，著书立传似乎成为了领导层一项心照不宣的惯例。同时，诸如《南方周末》这样的商业化媒体也不时发布对中国领导干部的访谈。在权力圈之外，大批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学会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一切似乎已经进入良性循环。但李成尖锐地指出，对于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来说，数量庞大、手到擒来的信息反而阻碍了真知灼见。不少观察者执迷于中国的负面新闻，并且一味描绘一个消极的中国。他们依赖传言和猜测，而不追求可以考证的信息。学者章家敦的那部《中国即将崩溃》就是一个“危言耸听”的案例。另一些人沉浸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不能自拔，因而失去了判断现有制度弊端的眼力。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力地弥补了一党制度的缺陷，使政府的领导地位越发稳固。



悲观也好乐观也罢，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做出严重的误判。据李成观察，三十年前最乐观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没能预测到中国后来的发展速度，而且 2001 年前关注中国能源需求的专家寥寥无几。事实上，中国经济不但实现了飞速增长，其能源需求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大因素。还有专家相信，受益于经济发展的中产阶级理所当然地袒护现行制度。但细心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但拥有更清醒的权利意识，而且对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等问题更加敏感。

近期最让李成担忧的是，有些乐观的美国专家认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权力交接会顺利有序地完成。然而，新一轮的交接很可能比上一次更复杂，因为现任的第四代领导人在就位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而即将登台的第五代领导人还需在百姓和同僚面前树立的威信。

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如果要摆脱误区，就必须摒弃一味地批判和赞扬这两种极端态度。如李成所言，中国社会在不断变化之中，甚至精英领导层的处事规则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美国的观察人员不及时调整心态和视角，他们将无法协助美国政府制定适宜的对华政策。

备注：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李成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转型和代际更迭。

参考资料：http://www.brookings.edu/articles/2011/1021_china_li.aspx

（本专栏由政见 http://cnpolitics.org/供稿。）



【FMN 新闻专栏】

媒体曝皮革制作工业明胶

央视 4 月 15 日在其节目中曝光了河北、江西、浙江一些厂商利用皮革下脚料制作**工业明胶**，并使用这些重金属铬超标的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的消息，新闻播出后立即引起了民众的关注。报道中还提到，这些药用胶囊被用作生产多种药品，并流入市场。

新闻：http://fmn.cc/HVsQsu

央视节目播出后，**河北**警方到学洋明胶蛋白厂进行执法时，该厂车间却莫名起火。转日警方确认厂区的火灾系该厂经理宋世训故意纵火，此前包括宋世训等该企业 22 名人员已被警方控制。

新闻：http://fmn.cc/HKmWwD
http://fmn.cc/HKmWwD
http://fmn.cc/HKog2r

媒体曝光这一同民众健康息息相关的内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当晚修正药业的官网被黑客攻陷，16 日通化金马和青海格拉丹东药业的官方网站也在被**黑客**攻下。黑客在首页的留言中表达了的对不法商贩的愤怒。

新闻：http://fmn.cc/HKna6K

由于包括修正、金马药业在内的国内 9 家药企的 13 种产品被检出铬超标，其中最高量达到超标 90 倍。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6 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 13 个药用空心**胶囊**产品暂停销售和使用。

新闻：http://fmn.cc/IE365K

媒体曝光的用皮革下脚料制作工业明胶，并使用这些重金属铬超标的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的消息，有“胶囊之乡”之称的**浙江新昌**送检的 96 批次胶囊样品，其中 33 批检出重金属铬



超标。同时，节目播出已多日，9 家涉事药企无一家对消费者致歉。

新闻：http://fmn.cc/JjN6V6

http://fmn.cc/IWi4VT

同时被警方查封的**河北**学洋明胶厂，在其中搜查到的证据显示用皮革下脚料生产的工业明胶产品曾流向食品企业，制作雪糕、冰淇淋、乳制品和饮料等食品。工厂的账册记载同多家食品公司的业务往来，不过其中的北京三元食品公司否认与其有关。

新闻：http://fmn.cc/JjML4V

新闻：http://fmn.cc/JjPYl2

食品安全

近来中国推行的营养餐计划造成多地学生食物中毒事件，据媒体报道，仅在**云南**地区，从 3 月 1 日推行实施营养餐计划一个半月的期间内，就发生 3 起食物中毒事件，而监管的缺失被认为是事故频发的主因。

新闻：fmn.cc/HMUIh8

近期中国被曝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可口可乐**山西**公司九个批次、约 12 万多箱的产品也被曝混入了含氯处理水，却因为质检部门出具了检验合格的证书，而被当作合格产品销往市场，事发 2 个月后终被外界所知。

新闻：http://fmn.cc/HKIVEJ/

4 月 18 日**山西**质监局在凌晨召开新闻通报会，称他们认为所送检的可口可乐山西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 9 个批次的产品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不过有媒体报道称，见到官方出具的检验单上芬达和醒目饮料的游离余氯是超标的，而且远远高于国家标准。

新闻：http://cn.fmnnow.com/?p=4681

广东深圳高新区内被曝存在一处死猪肉私宰点，他们收购病猪、死猪在此私宰，每天多达数十头乃至上百头，送往周边肉菜市场、工厂乃至学校食堂。广州、东莞、惠州等的客户也前



来进货，每日有超过万斤的病死猪肉流入百姓厨房。

新闻：http://fmn.cc/JjPMSO

由于有**上海**市民在家乐福超市购买鳕鱼，儿童食用后发生了腹泻，市民称超市出售的是有毒的油鱼，同时媒体调查发现一些海鲜市场确存在“以油充鳕”现象，消费者极难分辨，家乐福发声明称未将油鱼当鳕鱼卖，出售的是水鳕鱼。

新闻：http://fmn.cc/JjOZ4m

近日，**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微博爆料称，国内许多高龄奶牛，靠激素才能产奶，病牛还被注射了大量抗生素，国内只有少数品牌鲜奶可以喝。这条微博在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受到广泛关注，但中国奶协否认了这一说法。同时，有关人士称，牛奶中的激素并非必检项目。

新闻：http://fmn.cc/IOtHYB

重庆

4 月 10 日开始**重庆**万盛居民因抗议合区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4 月 12 日晚，重庆市政府回应称，当时总聚集人数最多的时候一万人左右，有 12 辆警车被砸，4 辆警车被烧，11 日警方进行了清场。事件起因是万盛居民担心合区后影响经济和医保等问题，上街表达了他们希望复区的意见。

新闻：http://fmn.cc/I9pBtI

4 月 10 日中共宣布了对薄熙来、薄谷开来的处理情况，11 日**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称薄熙来的行为令人震惊，损害了共产党和中国的形象，，并称干部应管好家属。重庆官媒则表示“3300 万重庆人民衷心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

新闻：http://fmn.cc/HOB6al
http://fmn.cc/HOC86b

媒体报道称，**重庆**政府开始彻查地方负债的相关项目，尤其是国企的负债情况，要求国企

“有事及时上报，无事报平安”。清查的 BT 项目因为同政府债务密切相关，重庆方面的这一举动也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新闻：fmn.cc/INu9vL

4 月 17 日**重庆**全市干部的一次会议上，该市组织部长徐松南称，要严查个别“一把手”不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凌驾于组织之上、独断专行、任人唯亲等问题。

新闻：fmn.cc/IWvVLU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 4 月 17 日晚间还发表英文评论，指称**薄熙来**事件是向各级党员干部警告滥权行为的结果，在文末则指出“对薄熙来事件的调查，可以解读为加强权力监督的举动。”

新闻：http://fmn.cc/I6bbuO

对于导致中国政坛风暴的英籍商人尼尔·伍德的死因，4 月 16 日路透社报道称，尼尔去年 11 月是死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他同薄谷开来关系密切，并帮助薄谷氏向海外转移财产，但他因经济利益威胁揭露薄谷开来转移财产一事，因此被毒杀。

新闻：http://fmn.cc/I6bTs9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至少有 39 人因为和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件有牵连而遭到拘押，他们目前被关押在海滨城市北戴河，而且该消息源还称被关押者主要来自**大连**。

新闻：http://fmn.cc/IOryMq

中国多地市民抗议政府政策

青岛投资 40 亿元在全市进行大规模的植树行动，密集的栽树改变了城市原有的面貌，虽然市政府宣称绿化行动有益城市，但因项目开展前未征求市民意见，并翻除了青岛大型广场的草坪而引发了市民、网民的强烈抗议，青岛园林部门 18 日致歉称会改进工作。

新闻：http://fmn.cc/JjPxqP



http://fmn.cc/JjO1Fd

同样引起广泛争议的还有**哈尔滨**发布的“禁狗令”，由于禁养大型犬的规定，并将很多中型犬也列入禁养范围，引发了市民、网络以及动物保护组织的反对。随后官媒发文称“屠犬”是谣言，哈尔滨公安局则称集中清理还未开始，并未虐杀没收犬只。

新闻：http://fmn.cc/JjNmDC

由于反对在家门口兴建大型化工项目，**天津大港**区的上万居民在上周爆发了抗议事件，这项号称年产 26 万吨的中国最大聚碳酸酯项目，被居民认为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而游行要求取消，事件发生后，政府已经宣布暂停项目。

新闻：http://fmn.cc/IOo906

互联网

中国官方 4 月 12 日对媒体表示，自三月中旬以来，中国清理了各类“**网络**谣言”信息 21 万多条，关闭 42 家网站。相关部门已将遏制谣言等违法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客传播作为重点工作。

新闻：http://fmn.cc/HCVyB9

4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40 分左右，中国多地网民反映**互联网**出现断网，无法访问海外网站，不过运营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都表示，上述时间内公司的网络并未出现故障，断网原因他们不清楚。工信部也没有做出回应。

新闻：http://fmn.cc/IHf3YJ

不过对于中国断网事件，有外媒引述外国工程师的猜测，是网络过滤导致的结果。报道中一位 CloudFlare 的工程师说，非 HTTP 流量保持正常这个现象暗示，某些人在**互联网**上过滤某些东西时出现了错误，他们可能在过滤整个互联网。

新闻：fmn.cc/J3j9Zi



4 月 13 日北京市公安局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加强**互联网**危险物品信息管理的通告》，其中要求对危险物品信息互联网发布，进行互联网信息服务许可、发布准入、接入审查、记录巡检、检查删除等五个环节的严格把控。

新闻：http://fmn.cc/IGLuCT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近日**北京**两家医院的医生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不明人士刺伤颈部，伤人者随后逃离，虽然最后两名医生都被抢救脱离危险，但连发的刺医血案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警方随后发布了协查通知，伤人者被怀疑是同一人。

新闻：http://cn.fmnnow.com/?p=4521

http://cn.fmnnow.com/?p=4606

根据发课公司工作人员在推特上的消息，4 月 13 日，发课公司到北京朝阳法院，就**北京**市地税第二稽查局的 1522 万元的税务处理处罚提起诉讼，法院表示 7 天内将通知他们是会否受理，12 日路青亦将两份起诉书寄往北京高院，希望此案能被受理。

新闻：http://cn.fmnnow.com/?p=4537

中国**财政部** 4 月 13 日公布了中国 3 月份和一季度的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中国财政一季度收入将近 3 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4.7%。去年中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 10 万亿。

新闻：http://cn.fmnnow.com/?p=4543

4 月 13 日晚，《21 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王思璟在家中被**北京**警方骚扰，扣押其身份证，并欲以她没有暂住证为名将其带走，期间王思璟多次拨打 110 并在网络上呼叫@平安北京。却未得到相应回应。

新闻：http://cn.fmnnow.com/?p=4552

4 月 11 日，**上海**浦东机场 20 余乘客因不满延误和赔偿问题，冲进停机坪的滑行跑道拦机进行维权，在 4 月 13 日，**广州**白云机场的一些旅客也因航班延误冲入停机坪拦飞机维权。拦



机现象的效仿效应受到外界关注。

新闻：fmn.cc/HEvaWK

近期有国土资源部的官员表示，**三峡**库区蓄水到高水位后将集中发生大量的新生滑坡和塌岸，地质灾害防治形势非常严峻，大约 10 万人将面临搬迁。

新闻：http://fmn.cc/JoY88e

近日**中国**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 5 年内事业单位将剥离行政和生产经营的职能，而其公益服务职能将进一步加强，同时过渡期内编制只减不增，这一政策将影响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 4000 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新闻：http://fmn.cc/IOUDY1

中国**财政部** 4 月 17 日对外公开了《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称，机场管理建设费被取消，改收民航发展基金。但是收费标准未变，引起了消费者的不满。

新闻：http://cn.fmnnow.com/?p=4657

http://fmn.cc/HWhGT3

据中国农业部新闻办公室 18 日消息，4 月 13 日**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发病鸡 23880 只。病鸡及同群鸡 9.5 万只全部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官方称疫情得到了控制。

新闻：http://fmn.cc/IOV1pm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余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秦晖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Online（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 (http://t.sina.com.cn/cochina)

编辑：黄海、柏蔚林 黄雯怡

校订：张博、姚梧雨童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陈楚君、周梦蕾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